

「2024 寫高雄－屬於你我的高雄歷史」

出版及文史調查獎助計畫

研究成果報告書

計畫案名

探尋與凝視：日治時期旅居高雄沖繩人士之個案研究

執行單位

蔡承豪

結案日期

2025 年 12 月

（研究成果報告書僅供參考，未經作者同意請勿引用）

2024 寫高雄－屬於你我的高雄歷史出版及文史調查獎助計畫

探尋與凝視：日治時期旅居高雄沖繩人士之個案研究

成果研究報告

目 錄

計畫摘要.....	1
一、前言.....	3
二、新天地：高雄的契機.....	5
三、公職領域的沖繩人士.....	10
（一）公務人員	
（二）司法從業人員	
（三）醫事人員：宜保之春	
（四）警務人員	
四、投身教職的沖繩人士.....	42
（一）流動的人才調配	
（二）於沖繩取得教師資格者	
（三）於臺灣取得教師資格者	
五、代表性的民間沖繩人士.....	57
（一）桃原良毅	
（二）宮良永昌	
六、結語.....	59
七、參考資料.....	62
附表、研究人士概況表.....	66

計畫摘要

在現代化與南進政策的推動下，高雄在日治時期快速蛻變為重要的工商業與軍事戰略要地，吸引了眾多來自沖繩的旅居者。這些人士不僅從事公務、教育、警察、醫療等官方職務，也活躍於漁業、工業及商業等民間領域，形成涵蓋基層至中層的多元群體。他們的到來，為高雄的故事增添了新的社會層次與文化色彩，也使高雄的城市風貌更為多元，並在城市的現代化過程中扮演了不可忽視的角色。

本研究旨在於過往探討日治時期旅居高雄的沖繩籍群體研究之基礎上，進一步藉由個案選取，從群體深化至多元的個案，藉由探討特定人士的動向，進一步了解其與地方社會的互動。承蒙「2024 寫高雄－屬於你我的高雄歷史出版及文史調查獎助計畫」之支持，得以推展本研究工作。研究採質性個案研究法（*qualitative case study approach*）為主要方法，藉由核心史料的篩選，選取具代表性之個案作為分析核心，透過重建與分析其移動背景、社會參與形式及文化適應歷程，試圖揭示日治時期人口移動與地方社會變遷之間的互動脈絡與歷史意涵。在研究設計上，個案選取以「職業多樣性」與「社會影響力」為主要指標，涵蓋從事公職、教育、醫療、商業及產業活動等不同層面的沖繩籍人士。資料蒐集方面，綜合運用多元史料來源，包括《公文類纂》、《臺灣總督府報》、《職員錄》等官方檔案，以掌握官方對移民政策及人事配置之制度性面向；另輔以當時之報刊、地方誌、個人回憶錄與戰後沖繩地區相關出版品，以補足官方紀錄之外的社會文化脈絡。

在資料處理過程中，鑒於研究對象之特性，本研究以歷史文獻學為中心，進行相關文本交叉比對與脈絡重建，以釐清各個案人物的來臺動機、生活軌跡及其與高雄社會之互動模式。透過對生命史資料的系統性整理與分析，不僅得以重構沖繩旅居者於高雄的社會實踐過程，亦可略為觀察其如何在殖民與近現代化的框架下，調適自我認同與文化位置。固然受限於文獻來源，選取的案例以公教職人員為主。雖相對於一般基層人士，其數量較為有限，但這些個體生命史的爬梳，仍有助於描繪沖繩移民或移住者在高雄的多元參與提供具體案例，也應可對理解日治時期剛高雄的社會流動與族群互動，提供另一種觀察視角。考量到文獻資料，本研究鎖定 28 位沖繩籍人士，依其職業背景分為三大領域：公職、教職與民間人士。公職者又細分為公務人員（福地原名、儀間正良、城間恒人、赤嶺直、上運天〔平川〕先次郎、友利惠任、神村孝太郎）、司法從業人員（花城長昱、高嶺方美）、醫事人員（宜保之春）以及警務人員（宮城久安、上原繁喜、伊川長壯、伊地柴清）。教職者部分，區分為於沖繩取得教師資格者（東恩納盛篤、久高友貞、漢那朝茂、平識政龜）與於臺灣取得教師資格者（東恩納盛亮、上原龜、山城正鳴、外間政善、東恩納信）。民間人士則列舉桃原良毅與宮良永昌二人。此外，當中並有部分人員係在退休後轉向商界服務者，在分類時仍以其原職為主要分類類別。

透過對這些來自異鄉的個案生命歷程與職涯發展的重構與分析，研究旨在豐富對高雄社會中能動性（*agency*）與適應韌性（*adaptive resilience*）的理解。這些微觀的生命敘事不僅揭示了殖民經驗下個體與群體的調適策略與歷史記憶，更為重新理解高雄作為一座移民城市的多元歷史提供獨特視角，同時呈現出當時多元族群間的互動樣貌與社會流動機制。



一、前言

歷史的宏大敘事，鮮少為那些被忽略的人物駐足。他們不屬於統治者的光輝篇章，也非被壓迫民族的中心故事。他們有時是國家體制中的遺珠，是制度縫隙裡流動的細沙。然而，正是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沙粒，共同堆疊出歷史的海岸線。因此，期望透過對這些個案生命歷程與職涯發展的深度分析，具體呈現他們在日治時期高雄社會中所展現的能動性與適應韌性。這些微觀的生命敘事，不僅反映了殖民經驗下個體與群體的調適策略與歷史記憶，更為重新理解高雄這座移民城市的多元歷史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同時，這也將揭示當時多元族群間的互動樣貌與社會流動機制。他們或許沒有留下具體的物質遺產，卻以一生的記憶與日常的語言，共同編織出這座城市獨特的南方風景。他們的故事，如同海上的浮木，總會在某個季風轉換的時刻，再度被潮汐溫柔地帶上岸來。高雄是個充滿活力的城市，來自四方的移民陸續抵達，尋求新的契機。

作為臺灣南部的門戶城市，自清代以降即為島嶼內部與外部人群流動的重要樞紐。進入日治時期，在總督府積極推動開發政策及基礎設施現代化的脈絡下，高雄的都市地位迅速上升，其港口被定位為南進政策的前哨，亦成為東亞貿易與軍事戰略的重要節點。隨著港灣設施的擴張與產業布局的深化，高雄逐漸擺脫漁村面貌，轉型為能夠吸納多元人口、勞動力與資本的新興都會，吸引了來自臺灣本島、日本本土及沖繩地區的人士入境。

對於日本時代沖繩人士的移民研究，已有又吉盛清、呂青華、松田良孝、朱惠足、朱德蘭、卞鳳奎、西村一之、金戶幸子、水田憲志與黃紹恆等諸多臺日先行研究者投入研究，整體研究已有若干累積，然主要以北部地區為重。¹ 聚焦於高雄地區者，研究主要偏重在職業類別與聚落之描述，如石丸雅邦²與

¹ 又吉盛清，《日本植民地下の台湾と沖縄》。沖繩：沖繩あき書房，1990。又吉盛清，《大日本帝国植民地下の琉球沖縄と台湾：これからの東アジアを平和的に生きる道》。東京：同時代社，2018。呂青華，〈基隆社寮島における沖縄人の調査報告〉，《東方學報》，25期（2005年10月），頁146-155。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10。呂青華，〈蘇澳南方澳沖繩人移民村今昔〉，《政治大學民族學報》，30期（2012年9月），頁1-35。松田良孝，《台湾疎開「琉球難民」の1年11ヵ月》。石垣：南山舎，2010。松田良孝著，邱琬雯譯，《八重山の臺灣人》。臺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12。松田良孝著，蘆荻譯，《被國境撕裂的人們：與那國台灣往來記》。臺北：聯經，2017。朱惠足，〈作為交界場域的「現代性」：往返於沖繩八重山郡島與殖民地台灣之間〉，《文化研究》，第5期（2007年秋季），頁49-86。卞鳳奎，〈日本時期在基隆的沖繩縣人(1895~1943)〉，《臺北文獻》，直194期（2015年12月），頁139-189。西村一之，〈但願捕魚成功：由臺灣東部鏢旗魚觀其民俗〉，《臺灣文獻》，54卷2期（2003年6月），頁97-112。水田憲志，〈日本植民地下の臺北における沖縄出身「女中」〉，《史泉(関西大学史学・地理学会)》，98號（2003），頁36-55。金戶幸子，〈1930年前後の八重山女性の植民地台湾への移動を促したプル要因—台湾における植民地の近代と女性の職業の拡大をめぐる—〉，《移民研究》，3期（2007年3月），頁1-26。水田憲志，〈1930年代の石垣島における台湾人農業移民の入植過程〉，收於野間晴雄編，《文化システムの磁場：16-20世紀アジアの交流史》，頁229-251。大阪：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2010。黃紹恆，〈戰前臺關關係之的建立、開展與客家人遷移〉，《客家研究》，7卷4期（2014年6月），頁109-141。

² 石丸雅邦，〈琉球人理蕃警察職員〉，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舉辦，「第三屆臺日原住民族研究論壇」，2010年8月27日

末武美佐³針對教師與警察的研究，又吉盛清與呂青華⁴對移民分布與生計的調查，以及黃于津與李文環運用哈瑪星地區戶籍資料的精闢族群分析等。⁵ 而筆者過往對於日治時期在高雄地區活動的沖繩籍民，已有較統整性的描述，並指出其在地活動的多元樣貌性。⁶ 然而，目前研究仍偏向族群群體，針對特定人士，觀察期生命歷程與職場變化，以做深化質性分析，進而呼應日治時期高雄的歷史變遷與時代脈動者，則尚有填補的空間。如星名宏修的研究指出，日治時期沖繩人與臺灣民眾之間，實有著深刻且複雜的關係，其觀點實甚值得關注。⁷ 故若可藉由更深化的質性研究，探討旅居者與在地的互動關聯，應可更為充分揭示特殊而具歷史意義的跨地域移動群體所展現的差異性與能動性。

日治時期在高雄活動的沖繩籍人士相當眾多。為深化分析，本研究廣泛檢索《公文類纂》、《臺灣總督府報》、《臺灣總督府職員錄》、《高雄州報》和《高雄州下官民職員錄》等官方文書與出版品，並參考近代出版的各類人物誌與商工人物資料，同時輔以戶籍文書、報刊雜誌等文獻加以比對。研究亦兼採沖繩地區之口述歷史資料與個人傳記，以補充官方記錄之不足。透過彙整前述多元史料，逐步勾勒出主要研究對象。這些主要研究對象活動於高雄的各級行政機關、學校、醫療與警察等制度性場域中，也有因應經濟結構轉型而赴臺尋求工商發展機會者，涵蓋代理商、出張所主任乃至自行創業的經營者。透過上述資料的交叉分析，本研究得以更清晰掌握沖繩籍人士在高雄的活動樣態與社會角色。

在過往研究中，筆者曾列舉出包括任公職的友利惠任（1895-?）、橫跨公職與商界的與儀喜助（1886-1968）、擔任教職上原龜（1879-?）、擔任醫生的宜保之春（1905-?）、司法界的花城長昱（1881-?）.....等 31 名日治時期於高雄活動的代表性沖繩籍人士，惟尚未逐一進行詳細分析，且隨相關史料的再挖掘，亦探查到若干值得再深入分析者。根據戰後初期統計，日治末期在臺沖繩人約 1 萬 5 千人，活躍於高雄者約有兩千人。雖然在整體人口中所占比例不高，然其分布領域橫跨公務、教育、警政、醫療、商業、司法、勞工、漁民、僱傭.....等各領域，儘管前述的若干先行研究已關注高雄的沖繩籍歷史脈絡，但仍欠缺以個案來深入觀察、彙整，解析旅居高雄的沖繩籍人士跨海來臺後的生活軌跡與社會參與。故藉由特定人物，進行其生命史之觀察與書寫，除賦予冰冷的檔案紀錄以溫度，更為了深入理解個體在歷史洪流中的真實處境與主

³ 末武美佐，〈日治前期臺灣公學校的沖繩籍教師(1895~1918)〉，《臺灣學研究》，11 期（2011 年 6 月），頁 59-85。

⁴ 呂青華，〈戰後在臺沖繩人的處境—高雄「入船町」個案〉，收於曲金良、修斌主編，《第十二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頁 419-431。

⁵ 黃于津、李文環，〈日治時期高雄市「哈瑪星」的移民與產業—以戶籍資料為主的討論〉，《高市文獻》，5 卷 1 期（2015 年 4 月），頁 6-37。

⁶ 蔡承豪，〈共力新天地：日治時期高雄地區的沖繩人士群像〉，《高雄文獻》，13 卷 2 期（2023 年 12 月），頁 33-83。

⁷ 星名宏修，〈「植民地は天国だった」のか—沖繩人の台湾体験〉，收於西成彦編，《複数の沖繩 ディアスポラから希望へ》（京都：人文書院，2003），頁 169-196。

體意識。

但由於多數個人資料有限，其生命軌跡難以完整呈現。本研究以先前蒐集的 31 名沖繩籍人士簡表為基礎，再進一步聚焦至 28 名資料較為集中者（詳附表），試圖在殖民治理架構與移民社會互動的交織脈絡下，探討沖繩籍旅居者在高雄的遷徙背景、遷移選擇邏輯，以及其社會活動型態。透過前述史料之爬梳及回憶錄之蒐集，重構其於高雄社會中的多樣參與位置，並揭示其如何於殖民制度縫隙中尋求生活空間、建立社群網絡，最終成為高雄這座南方港都歷史之一部分。透過對其家庭背景、遷徙動機、職場經驗與社交網絡等面向之細緻考察，描繪出其群體在臺灣的社會結構中之生存策略與生命韌性。

此外，所探討之活動空間除以今高雄地區為主要範圍外，鑒於屏東地區當時隸屬高雄州，且高屏兩地在歷史發展上共享緊密之社會、經濟與文化連結，故本研究亦將適度涵蓋屏東地區。至於上述沖繩籍人士的在臺經驗，其來到高雄的原因可大致分為兩類：部分係因公務體系或企業組織的職務調動而被派遣至高雄；或基於個人意志與生涯規劃，主動選擇前來者。基於成因的多元性，本研究以「旅居」作為分析題名，以兼容官方調派與自主遷徙兩種動因，並凸顯其居留具有跨地域移動與階段性停留的特質。



圖 1、大正 13 年（1924）高雄州管內圖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二、新天地：高雄的契機

作為一個崛起的都市，日治時期的高雄提供沖繩旅居者諸多就業、經商與

從事公教職的場域，不僅成為他們離開本鄉後尋覓新生活的落腳點，更象徵著一種制度秩序中可見的「希望性」(*aspirational dimension*)。隨著港口建設、產業布局與都市規劃等多層面的持續推進，高雄成為南臺灣乃至整個戰前日本帝國南進政策中的關鍵據點。在這樣的新天地中，對於來自邊陲島嶼、長期處於「帝國內地之外」的沖繩移民而言，高雄不僅提供可見的經濟報酬與職業機會，更開啟一種相對流動的社會空間，讓他們得以重新定義自身位置，拓展階層上升的可能性。

（一）多元的就業機會與「吸力」

沖繩群島分布廣泛，自北部的大東諸島至南端的八重山群島，地域跨度大，各地在語言、文化與社會結構上皆有所差異。八重山群島以石垣島、西表島為主要島嶼，宮古群島則以宮古島為核心；相較之下，沖繩本島所在的琉球群島在政治、經濟上長期居於中心位置。但地理上，八重山距離臺灣更近，因而與臺灣之間存在著較密集的漁業往來、海上交通與交流的傳統，形塑出其與沖繩本島不同的外部連結。因此，「沖繩人」在臺灣並非同質性的單一族群，八重山群島移住者多從事農漁業及基層勞動，反映出地方產業結構與移動動因的特質。沖繩本島出身者除了包含勞工與漁民外，更有相當比例的官職人員、教育與醫療專業者、警察體系成員及工商管理者。此種差異顯示，跨海移動並非單一模式。

進入日治時期，因地緣因素，沖繩移民多集中於臺北、基隆、宜蘭等北部地區，但仍有一定數量的移民選擇南下高雄。據鼓山戶政事務所的戶籍資料，哈瑪星及其周邊地區為主要聚居地，這與當地的港口、交通與產業發展息息相關。高雄在日治初期即被官方設定為南部的的主要貿易港口，啟動港口現代化建設與臨港鐵路系統，形成「打狗築港計畫」，成為臺灣資源輸出的樞紐。隨後的製糖產業發展、化工與軍需工業基地的設置，加上南進政策對外擴張的需求，高雄逐漸轉型為戰略型工業城市，也成為大量勞動力與專業人員集中的地點。

這樣的城市發展動能，不僅吸引本島的勞動力人口，如澎湖、臺南、嘉義、屏東等地居民，也成為沖繩地區移民的目標。沖繩籍人士來高雄的目的多元，涵蓋商貿、教育、警察、漁業與工業等領域，反映出此地對移民而言不僅是就業機會的場所，更是融入帝國發展脈絡的前線。在這一過程中，沖繩區的勞動力被引進至高雄，對當地社會與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日治時期，臺灣與沖繩同屬日本帝國的統治範圍，兩地納入同一國家體制，使人員往來得以在「國內移動」的框架下進行，無需繁複的出入境手續。相對於海外移民，高雄對沖繩人而言是一處兼具制度便利與文化連結的移居地。此外，日本政府對臺灣的統治採用系統性的基礎建設與現代化手段，鐵路、公路與港灣的建設，尤其是西部縱貫鐵路（1908 年全線通車）大幅縮短了島內南北的交通時間，使高雄與北部港口連結更為緊密。對於初抵臺灣的沖繩移民而言，即使最初登陸的是北部港口，仍可快速透過鐵路南下至高雄尋找發展機會。

而沖繩地區本身的自然與社會條件，為移民提供了明確的「推力」。由於地狹人稠、耕地有限，加上長期的社會階級制度與日本內部對沖繩人的差別待遇，使得沖繩成為近代日本主要的人口移出地區之一。1880 年代起，沖繩人即大量向海外遷移，初期以夏威夷、美國本土與菲律賓為主要目的地，後因美國移民限制趨嚴，部分轉向南洋或臺灣。

相對而言，臺灣尤其是高雄，提供了明確的「拉力」。此地的產業需求旺盛，特別是漁業、製糖、建設、軍需工業等勞動密集產業，對中下層的勞工有大量需求。同時，作為新式都市的高雄，也對教育與行政人才產生需求，使得部分受日本教育體系薰陶的沖繩人得以進入公部門服務，如擔任警察、教師等職務。而高雄的臨海性質更為沖繩漁民提供了自然優勢。部分八重山地區的漁民，熟悉海洋環境，配備堅固漁船，可跨越距臺灣一百餘公里的海域，自行前往南臺灣、東沙群島等地從事漁業活動。高雄，作為港口與漁業中心的地位，進一步吸引這些人以此為基地展開長期活動。

值得注意的是，明治 29 年（1896）啟航的「內臺航路」與其後調整為經鹿兒島、沖繩、八重山、基隆、安平、高雄等地的航線，也在物理距離上拉近了沖繩與臺灣南部的接觸機會。雖然此類定期航線存續時間不一，但為移民探索南部的可行性提供了交通基礎。

高雄港的築港工程，其肇始於明治 41 年（1908），擘劃宏遠，歷經三期擴建，實為臺灣近代化進程中重要的基礎建設之一。其工程範疇廣泛，不僅涵蓋港池的浚深與擴張，亦包含大規模的填海造陸，以及倉儲、運輸等相關配套設施的興建。如此浩大的工程規模，對勞動力產生了前所未有的需求。為支應築港所需之大量勞動力，官方與包商陸續引入來自日本內地與沖繩之工人。沖繩籍勞工多來自那霸、宮古、八重山等地區，部分為築港工程之專門技術工，更多則從事基礎的苦力、搬運與碼頭作業。為高雄港的早期發展貢獻了重要的勞動力量。

（二）殖民體制中的官方職缺與流動契機

除了從事民間職業之外，軍公教等官方職務亦為沖繩籍人士提供了向上流動與職涯發展的機會。早在明治 28 年（1895）日軍出兵臺灣之際，即已有若干來自沖繩的軍伕隨軍抵臺，參與武力進佔與後續的治安維持任務。隨著臺灣納入日本版圖、成為其新領土後，因應母國的治理體系，需從無到有建立起來，無論在行政、教育、醫療、警政等面向，皆須大量具備語言能力與現代行政素養的人力支援。日本政府遂大幅擴增派駐人員與在地培養職位的名額，形塑出規模龐大的公教體制，也開啟一系列跨地域人員的流動與職位流通。

從制度設計的角度觀之，臺灣總督府的官僚組織在當時整個日本帝國體系中編制龐大，據統計名列前茅，甚至可排入全帝國前五，超越日本本土多數地方政府的規模。相較於競爭激烈、進入門檻較高的本國職場，臺灣的職缺反而成為部分具備資格者的另類出路。由於部分日本人士對南方環境與派駐地點

有所顧慮，然由於沖繩群島本身即屬溫暖濕潤之氣候帶，其居民長期以來即具備應對高溫、高濕等自然條件的生活經驗與生理適應力。此一環境熟悉性，對於赴臺從事需長時間戶外活動或駐留於氣候相近地區之行政、警政與衛生相關職務，提供了相對優勢。

此外，明治政府於 1872 年首先將琉球王國改編為「琉球藩」，隨後於 1879 年實施「琉球處分」，正式廢藩置縣，設立沖繩縣，此舉象徵日本對琉球地區行政、領土與主權的全面整合與確立。此一治理轉型不僅體現日本近代國家領土擴張的實質進程，也為中央政府推行教育、行政與制度現代化提供了契機。為落實中央集權體制，明治政府自 1880 年代起逐步於沖繩推展與日本本國相仿的國民教育制度，興設小學校、簡易教育機關與師範學校，並由文部省派遣教師進行課程指導與制度移植，推動日語教育及近代學科的普及。

至 19 世紀末，沖繩縣已基本建立起涵蓋初等教育至師資培育的教育架構。雖在設施規模與資源配置上與日本本土仍有差距，然此一教育近代化歷程，使得若干以士族為主的沖繩人士獲得正規日語教育與日本式行政訓練，逐步累積參與公職體系之基本能力與文化資本。當日本於明治 28 取得臺灣，進行行政建構之際，這批具備語言與基礎行政素養的沖繩籍人士，遂成為總督府施政過程中可資調用的重要人力。

特別是在語言普及、庶務行政、初級教育與基層醫療等實務性領域，沖繩人往往因其雙重適應性而被賦予中介角色——既能銜接本國制度與殖民地施政需求，又較易融入南方島嶼社會的生活環境。此種「制度轉譯者」的功能，亦使沖繩籍人士在高雄等新興都市中，逐漸嶄露參與空間與社會功能，成為臺灣治理體制下不可忽視的人力資源組成。

此外，殖民地服務常伴隨「在勤加」制度，亦即赴臺任職者可按俸級享有相當比例的加給，幅度隨地區與時期略有不同，但一般在臺灣與朝鮮等地常達本俸六成，並附帶住宿、派遷等多項津貼，具有實質誘因。對沖繩人而言，臺灣不僅是一處地理相近的派駐區域，更可能是一個具開拓性與發展性的工作場域。

在基層職位方面，沖繩籍人士亦多見於庶務行政、教育助理、警察輔佐、醫療技術員與其他後勤職系。他們在語言通用、文化相近的背景下，往往能在臺日之間發揮協調與溝通功能，並於日常治理實務中扮演穩定角色。對殖民當局而言，沖繩人既熟悉帝國法令與教育，又能融入地方環境，在治理策略上具有一定的「適任性」。

因此，自日本領臺初期起，即可見沖繩籍人士透過軍政體系、學校機關與地方行政等多元渠道進入臺灣，並在高雄逐步建立起清晰可辨的官方任職足跡。這一制度性移動不僅回應了殖民統治所需的人力資源需求，也構成了高雄城市發展與社會結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一環，揭示出殖民近代化進程下，多元人群如何嵌入都市與國家機器之中，共同塑造地方治理的實質面貌。

（三）特殊的觀察指標

綜上所述，沖繩旅居者在日治時期進入高雄的歷程，除了經濟誘因或個人動機驅動，而是多重結構性條件與制度性安排交織所促成的結果。

一方面，明治政府自 19 世紀末以降對沖繩地區施行行政改制與教育現代化政策，使得一批沖繩籍人士具備日語能力與日本式行政知識，形成潛在的治理人力來源；另一方面，臺灣納入日本版圖後，總督府為因應行政治理與都市發展所需，急需大量具語言與制度適應能力的人力資源。高雄作為南部戰略重鎮與新興工業港市，在殖民政策引導下迅速發展，吸引包括沖繩人在內的多方移民參與都市建設與基層管理。在此背景下，沖繩人士不僅活躍於築港工程、遠洋漁業與都市勞動體系等基礎性產業，也透過制度派遣進入軍公教體系，於教育、行政、醫療等領域擔任具實務功能的職務，發揮中介性的社會角色，並在高雄社會文化層面亦逐步建立起穩固的社群網絡與生活空間，成為顯高雄作為南方門戶城市的多元性與「希望性」象徵族群之一。

在職業結構方面，沖繩籍人士在高雄的就業狀況呈現多樣性：漁民以臨港地帶為活動核心；教師、警察等則分布於市街庄與鄉間地區，參與地方社會治理與教育體系運作。此類移民的存在，既是殖民體制下勞力與人力配置的產物，也在地方社會中留下文化互動與族群融合的痕跡。

更值得注意的是，沖繩人被納入殖民秩序中的一環。他們的身分一方面具有日本國民的地位，但在文化上與本土日本人（內地人）仍有距離；另一方面，相較於臺人又具有更高的語言與制度熟悉度，使其在制度縫隙中佔有一席之地。這種多重邊緣的位置，也使沖繩移民成為理解殖民地社會結構的重要指標。尤其是在高雄這樣的移民城市，沖繩籍人士所展現的社會角色與位置，進一步體現了多元族群秩序的複雜運作。他們往往被賦予協助政權下達政令、推動地方治理的中介功能，卻同時在地方社會中面臨文化歸屬與認同的拉鋸。這種「既屬於、又不完全屬於」的存在狀態，使其在階層結構與文化身份之間維持著高度的調適性與靈活性。

此外，沖繩籍旅居者在高雄所參與的社會活動，也呈現出從基層經濟參與到公共服務的多重層面。他們不僅是行政體制下的人力資源，也是促成在地發展與現代化過程中不可忽視的某種推動者。透過學校教育、警政執行、醫療衛生等公共部門的日常實作，沖繩人主動或被動融入地方社會的制度運作；而在民間經濟層面，則透過經營商號、投入漁業與製造業等方式，參與二十世紀高雄的經濟結構轉變。透過這些個案所勾勒出的細緻圖像，將有助於更全面理解高雄作為一座移民都市的歷史面貌，也為探討沖繩人跨地域遷徙與社會適應的經驗提供具體而生動的素材。



圖2、日本時代高雄港：現代化機具與絡繹船隻交織的繁榮景象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三、公職領域的沖繩人士

日治時期，在南進政策的推動下，高雄迅速由漁村轉型為工業與軍事重鎮，成為吸引沖繩移民的重要據點。這批人士不僅在民間經濟領域活躍，更有一群人進入體制內部，擔任公務人員、司法官與醫事專業等職務，參與地方行政與社會治理，嵌入臺灣的官僚與專業結構。

（一）公務人員

在日治時期高雄因南進政策而快速現代化的背景下，新的行政建置帶動大量公部門職缺的產生，亦因應都市規劃與產業管理之需求，亟需具備語言與制度知識的日籍人員進駐。對於沖繩人士而言，其作為日本帝國邊陲所培養的中層技術與行政人才，在本籍與殖民地之間的特殊位置，使其較易獲得初等與中階公職的任用。

1、北川涉吉

北川涉吉（1863-?），日本文久 3 年（1863）12 月 25 日生於兵庫縣播磨國揖保郡林田，原籍沖繩縣大宜味間切塩屋村，出身於士族家庭。作為一名帶有軍事訓練背景的地方官員，他的一生展現出近代日本地方行政人員在日本擴張過程中的典型軌跡——在軍事、教育與地方治理之間穿梭，並隨著帝國版圖的拓展而展開跨地域的職務流動。

明治 18 年（1885）前後，北川受訓於陸軍教導團步兵科，並曾在沖繩分遣隊服役。隨後，他轉入教育與行政領域，歷任沖繩師範學校書記官、沖繩縣尋常師範學校雇教員，亦曾出任沖繩縣巡查及八重山島役所職務。這一時期的北川，正處於從軍事人員向教育與基層行政轉型的階段。

明治 30 年（1897），北川涉吉獲任臺東撫墾署主事補，正式踏上殖民地行

政的舞台，亦可視為最早一批赴臺任官的沖繩籍人士之一。當時他年逾三十，正值壯年，其來臺應是基於個人意志的選擇，意圖在臺灣這片新開拓的天地尋求發展契機。翌年，他旋即轉任嘉義縣主事補，隨後又歷經西港弁務署等地的勤務。至明治 32 年（1899），北川出任臺中縣北港辨務署主記，但不久後即依願免職，返回日本，於鹿兒島第三中學校擔任書記兼會計主任。這段往返的經歷，不僅突顯其仕途的高度流動性，也映照出日治初期人事調度的頻繁與不確定性。⁸

不過，他旋即再度返臺。明治 33 年（1900）起，北川受雇於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負責會計業務；同年夏轉入臺灣總督府民政部通信課，任通信書記。明治 36 年（1903）至明治 37 年（1904），他調往鐵道部打狗出張所任書記。⁹此時，總督府正全力推動南部鐵路建設，打狗（今高雄）作為南端港口與運輸樞紐，扮演連結南北的重要角色。整體的南部鐵路工程於明治 32 年 9 月從打狗向北推進，並於隔年 11 月 2 日與臺南之間試運轉，同年 11 月 28 日舉行了正式的通車儀式。因鐵道工程不僅關乎物資輸運與軍事部署，更是日治初期現代化基礎建設的核心項目，故南部的鐵路持續往北延伸。北川身居書記之職，在行政與會計層面參與了這一殖民地近代化工程，顯示他在體制內的功能，並非僅限於地方行政，而是延伸至基礎建設領域。

除公務職涯之外，北川亦積極參與地方社會網絡的建構。明治 34 年（1901）《臺灣日日新報》報導，他被推舉為臺北在鄉軍人會幹事之一。該會會員逾四百人，主要由退伍軍人組成，是日人在臺北的重要社會組織。¹⁰北川的參與，不僅呼應其軍人出身，也突顯他在官方與民間之間的雙重身分。

在鐵道部打狗出張所服務之後，史料中關於北川的記錄日漸稀少，顯示他可能又離開臺灣。縱觀其職涯，正好反映出近代日本基層軍職人員的身份轉換與跨地域的流動特徵。他曾往返於沖繩、鹿兒島與臺灣，歷練於撫墾署、縣廳、土地調查局、通信課與鐵道部，展現出行政人員的多重功能。這樣的履歷或與他兼具行政與會計能力有關，不僅顯示其個人適應力，也體現了日治初期行政體系的彈性運作。北川涉吉的生命歷程，折射出日本帝國在臺灣初期治理中的基層官員樣貌，以及政務與基礎建設推動背後的實際人員流動。

⁸ 「北川涉吉（雇二採用）」（1900-05-01），〈明治三十三年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永久保存第一二五卷庶務課〉，《臺灣總督府檔案・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317048。

⁹ 「北川涉吉臺灣總督府通信書記二任ス」（1900-08-29），〈明治三十三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追加第十三卷官規官職〉，《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573082。

¹⁰ 〈臺北在鄉軍人會の近狀〉，《臺灣日日新報》，1901 年 4 月 11 日，2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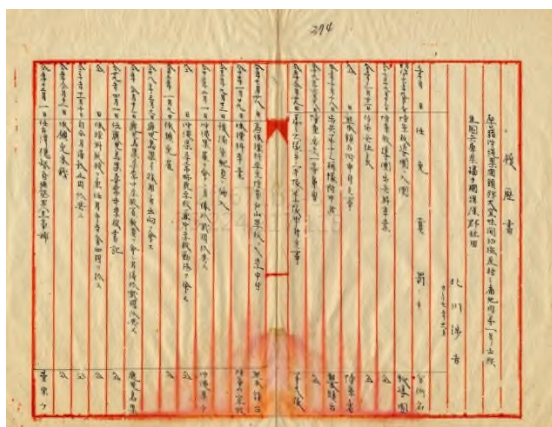


圖 3、北川涉吉之履歷書

圖片來源：「北川涉吉（雇二採用）」。

2、福地原名

福地原名（1874-?2）生於明治 7 年（1874）12 月 4 日，籍貫為沖繩縣島尻郡大里間切上與那原村三十一番地，出身平民之家。

明治 18 年（1885），福地原名進入大里尋常小校就學，歷經尋常科與島尻高等小學校的修業，並於明治 24 年（1891）進入沖繩縣尋常中學校。然而，或因家庭與生計等因素，他於明治 25 年（1892）僅完成二年課程後選擇退學。雖未完成正規中學教育，正值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亟需具備基礎教育與一定書寫能力的人才，以應付統治機構的建立與運作。這使得像福地原名這樣的沖繩青年獲得前所未有的機會。

因日治初期的建設需求，福地或因此先來到臺灣找尋其他工作，後獲得進入公部門任職的契機。明治 32 年 8 月 1 日，福地原名被錄用為臺灣總督府民政部雇員，日給 70 錢。僅數月後，因工作表現勤奮，獲頒賞金 4 圓。明治 33 年 7 月 10 日，他的待遇提升為日給 80 錢，並於同年 7 月 20 日正式被任命為總督府雇員，月俸 25 圓，分發至警務課勤務。

福地原名的能力與認真態度逐步受到肯定。明治 35 年（1902），他轉任警察本署總長專屬雇員，任書記，獲月俸 28 圓，顯示工作已趨穩定。年底，他因勤勉再度獲賞金 27 圓。此時，他亦開始參與與統計業務相關的講習，逐漸具備專業技術背景。¹¹

自明治 36 年起，他的職務一度在警察本署與專賣局之間流動，並獲得「統計講習證書」，為日後在總督府體系內從事實務統計與庶務工作奠下基礎。¹²或因具備統計專業，他於明治 39 年（1906）被任命為蕃薯寮廳總務課技手，來到高雄地區任職。此後數年間，他穩健地在地方廳署內累積經驗，後再轉往臺

¹¹ 「福地原名」（1904-01-01），〈明治三十七年元在官者履歷戊〉，《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112577018。

¹² 「統計講習證書授與人名」（1903-12-01），〈明治 36 年 12 月臺灣總督府報第 1436 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11436a014。

東廳庶務課技手。¹³官方紀錄顯示，他在明治 45 年（1912）仍在臺東廳服務，但其後在檔案與新聞中已未再見其名。

其職務雖非高官，卻屬基層行政運作中不可或缺的人員。例如，他曾以書記的身分參與警察專用電話工手會議（1906 年 5 月 23 日）¹⁴，這是一項關於串聯警政聯繫系統的重要技術工程，用以因應通報與掌控地方治安事務，顯示他在技術性與行政性事務間皆有實務角色。

福地原名的一生，展現了日治初期沖繩平民子弟憑藉教育與努力逐步進入臺灣統治體制的典型案例。因初期人力需求龐大，他得以進入臺灣總督府服務。隨著勤勉與專業進修，他從最初的日給雇員，逐步攀升至各地廳署的技手職務。福地原名憑藉「勤勉得賞」、「獲授講習證書」、「技手任命」等累積的歷程，不僅成就了個人事業，也成為日治前期沖繩籍人士在臺灣立足的縮影。

3、儀間正良

儀間正良（1881-?）出生於明治 14 年（1881）5 月 10 日，是日治時期活躍於臺灣的沖繩籍地方官員，出身沖繩縣國頭郡伊江村，畢業於沖繩縣立中學。

儀間正良早年在故鄉伊江村擔任村長，為該村首位透過選舉產生的村長。之後，他進入日本政府體系，歷任島尻郡書記、臺灣郡屬、高雄州書記、東港郡書記等職務。昭和 9 年（1934），轉任屏東市役所財務課。昭和 12 年（1937）至 16 年（1941）間，擔任高雄州東港郡琉球庄庄長，成為地方的領導人員，期間積極推動地方行政與發展。

在擔任琉球庄長期間，儀間正良致力於地方建設與行政管理。他推動成立「琉球漁業組合」，協助當地漁民組織生產與銷售，並於昭和 16 年改制為「保證責任琉球漁業協同組合」，進一步強化漁業經濟體系。

在個人生活與興趣方面，他與妻子良子育有養子清武（生於大正 8 年）與養女千代子（生於大正 10 年）。儀間正良的興趣包括閱讀、盆栽與釣魚，展現其對自然與文化的熱愛。¹⁵

儀間正良作為沖繩籍官員，在日治時期的臺灣地方行政中扮演重要角色。他的任職反映了當時官方對沖繩人力資源的運用，以及沖繩人對臺灣地方發展的貢獻。其在琉球庄的施政，對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成為臺灣與沖繩歷史連結的重要人物之一。

¹³ 臺南新報社編，《南部臺灣紳士錄》（臺南：臺南新報社，1907），頁 496。

¹⁴ 〈專用電話工手會議〉，《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5 月 23 日，3 版。

¹⁵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頁 68。太田肥洲，《新臺灣を支配する人物と産業史》（臺北：臺灣評論社，1940），頁 531。



圖 4、《臺灣人士鑑》中對儀間正良之介紹及其照片

圖片來源：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頁 68。

4、城間恒人

曾任高雄州內務部長的城間恒人（1883–1930），生於明治 16 年（1883）6 月 23 日，原名城間恒仁。其戶籍所在地雖記載為東京府，但其實出身於沖繩士族家庭，此一情況應與琉球處分後尚氏一族及相關士族被迫遷居東京的歷史背景密切相關。

明治 12 年（1879）廢藩置縣後，琉球王尚泰（1843–1901）及其家族被移往東京居住，並編入華族名籍。隨同王府而失去原有政治基盤的諸多士族，也陸續在東京及內地各地定居，轉入帝國社會的新秩序之中。城間家族正是此一歷史脈絡下的代表性案例，城間恒人遂於東京出生並成長於內地環境。

在學業方面，城間早年接受嚴謹教育，進入第七高等學校造士館就讀，於明治 39 年 7 月完成第一部法科學業，為該屆僅有的兩名沖繩籍學生之一。隨後，他升入東京帝國大學法科，於明治 43 年（1910）7 月取得法學士學位。翌年，他通過文官高等試驗，成為沖繩出身者中最早進入帝國官僚高級考選體系的合格者之一，並由此正式展開其官僚仕途。

在婚姻方面，城間迎娶大關千代子為妻。大關千代子之兄大關增勤（1867–1940），出自江戶時代大名之家，明治維新後列入華族名冊。此一聯姻不僅使城間家族與內地華族社會建立起直接的親屬連結，也進一步鞏固了其在帝國社會結構中的立足基礎。透過婚姻網絡，城間得以與華族社會建立更穩固的社交與政治關係，並在其官僚生涯中具備了額外的社會資源。

城間恒人與琉球王家尚氏之間的聯繫，尤其在二十世紀初，透過幾起重大事件得以略窺一二。琉球末代國王尚泰逝世後，其長子尚典（1864–1920，和名中城王子朝弘）繼承侯爵爵位，並進入日本華族體制，長期擔任貴族院議員。尚典一方面延續琉球王族的傳統身份，另一方面亦活躍於東京的貴族政治與

社會活動，象徵琉球舊王室在新政治體制中的存續。大正 9 年（1920），尚典因病危重。當時東京尚家於對外通報名單中特別包含城間恒人，顯示其在王族事務傳達體系中的重要地位。隨後尚典薨去，葬儀在東京舉行，城間亦與相關人士一同參與其中。而尚典之弟尚昌（1880–1923）繼承侯爵位後，同樣進入貴族院。然而，尚昌於大正 12 年（1923）病逝，喪儀再度於東京舉行。由於城間當時因官職任務不在東京，未能親自參與，遂由其妻大關千代子代為出席，以「代拝」身份在尚家葬儀上現身。此外，城間在 1920 年代仍積極涉入沖繩士族事務。其致函護得久朝惟（1868–1923），討論故小夜子之遺產處理事宜。護得久朝惟為向氏家族出身，曾任眾議院議員。此一書簡今存於那霸市歷史資料館，為研究者提供了城間在親族財產分配及士族網絡中角色的重要史料依據。種種活動，反映出他與尚家的關係，也反映其作為士族後裔與帝國官僚之間的雙重角色。

在生涯的不同階段中，城間的行跡展現了二十世紀初帝國官僚、華族家族與沖繩士族事務的交織。明治 45 年，城間恒人開始官僚生涯，最初任職於秋田縣內務部。大正 2 年（1913）7 月 31 日，他升任河邊郡長，位階為高等官 7 等，並於同年 10 月敘從 7 位。翌年 7 月 13 日，他轉任山本郡長。後雖一度休職，其後再轉入樺太廳，歷任理事官、兼任函館專賣支局副參事，後升任警察部長（大正 7 年至大正 13 年），又曾擔任拓殖部長。此一階段的歷練，使其在警政、專賣、拓殖等殖民地關鍵行政領域累積經驗，並展現跨地域任用的特徵。此後，他再度獲調動，進入南方臺灣服務，最終出任高雄州內務部長。

城間恒人在大正 11 年即曾來臺訪查交流。¹⁶ 至大正 13 年 12 月，相關消息發布，城間恒人正式被調往高雄。當時的報導並特別標示：「新自內地來」。大正 14 年（1925）2 月起，城間恒人正式就任高雄州內務部長，直至昭和 2 年（1927）卸任。在任期間，作為地方行政最高主管之一，他負責的業務範圍廣泛，涵蓋高雄、屏東與澎湖，並牽涉澎湖設廳的籌劃與行政分工，顯示其職務的重要性與地方治理的複雜性。

在上任的致詞當中，城間恒人便表示他首次來到南方任職，因不甚熟悉，還請同僚們多多協助。自大正 14 年起，城間恒人兼任高雄州協議會員、文官懲戒委員會委員及普通試驗委員長，積極參與人事審查與州政運作，成為地方官僚體系中關鍵人物。他的行政活動不僅限於庶務，亦涉及眾多公共儀典與官方迎送場合。大正 14 年，他曾出席澎湖招魂大祭，並負責接待來訪的山縣公爵；翌年，高松宮殿下南下巡視高雄，他同樣在場奉迎，並參與新嘗祭、九塊庄拔穗祭等農事祭典。大正 15 年 10 月至 11 月，他亦迎接北白川宮大妃殿下的巡視行程。此外，他於歲末出席御用納式、封印式等例行禮典，展現地方內務行政在儀式層面的延伸。

在教育與文化活動方面，城間恒人亦有諸多參與。大正 14 年他出席鳳山

¹⁶ 〈城間氏來臺〉，《臺南新報》，1922 年 12 月 17 日，2 版。

郡教育會，翌年 3 月又至屏東郡教育會；大正 14 年至大正 15 年間，則積極參與國語演習活動，包括高雄州國語演習會、全島國語演習會與潮州公學校演習，藉以推動日語教育的普及。其後，他亦出席南鵬補學校、屏東農業補習學校的畢業典禮，並參與地方少年團的結團儀式，具體呼應總督府教育政策在地方的落實。

經濟與產業事務方面，他參與高雄州青果同業組合與臺灣青果同業組合聯合會，並擔任聯合會副組長，自大正 14 年至大正 16 年間，多次主持或參與其創立大會、評議會與總會。¹⁷大正 15 年 6 月，他出席旗山信用組合活動，並與曹公水利組合、高雄州農會等組織保持密切合作。同年 7 月，他參加澎湖廳開廳祝賀典禮，涉及跨區域的行政交接。公共建設與地方工程亦在其業務範圍內，他曾參與高雄水利協議會、曹公水利組合及埤川新設工程的相關討論，並於大正 15 年 6 月 28 日出席東港三大工事落成典禮。同年 7 月，又參與高雄神社造營計畫，年底則主持各課預算案的審議，顯示其職務涵蓋地方基礎建設與宗教空間的規劃。

城間恒人亦多次出席短艇比賽、水泳閉場式、弓術競賽、體育大會及野球比賽等活動，並積極參與勞工與商業界的表揚與慶典，包括勤續店員與傭人表彰式、大阪商船高雄支店落成式、南部製酒始業式等，顯示其在地方社會的廣泛參與與代表性。軍事與外交場合亦是其活動之一，大正 15 年 11 月，他隨行軍事將領參加秋季演習觀兵式；翌年 4 月，第二艦隊停泊高雄港時，他亦出席艦上招宴與相關活動。此外，他也參與接待外國船舶與領事館場合，顯示其職務觸及地方層級的外交事務。

城間恒人任職高雄州內務部長期間，並以沖繩子弟的身分，主持了牡丹社事件琉球藩民墓碑的改修工程。

建於恆春車城的琉球藩民墓，初始係為紀念清同治 9 年（1871）喪生於恆春地區的八重山宮古島漂流民。隨著時間流逝，墓地荒廢，碑文剝蝕，少有人問津。到了 1920 年代，唯一倖存的生還者島袋龜（?-1927）已年逾古稀，他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返臺，答謝當年救助其餘生的車城人家族。這份心願經由琉球學者伊波普猷（1876-1947）與臺灣總督府交通局人脈傳遞開來，逐漸演變為一場跨海的修墓與尋人運動。伊波普猷的好友照屋宏（1875-1939），時任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工務課長，對此事尤為熱心，實際上承擔了領導與推動的責任。他不僅協助島袋龜聯繫官署，並串聯琉球旅臺人士成立「沖繩臺灣人會」，以社團力量募集資金、動員網絡，成為修墓運動的核心力量，不少當時或日後在高雄活動的沖繩人士（如高嶺方美、桃原良毅、山城正鳴、漢那朝茂……）皆捐資響應。¹⁸

修建工程除了欲回應倖存者與遺族的心願外，修建也被地方有志者理解為

¹⁷ 臺灣青果同業組合聯合會編，《臺灣青果同業組合聯合會創立十年史》（臺中：臺灣青果同業組合聯合會，1937），頁 28-31、45。

¹⁸ 《牡丹社遭難民墓碑改修報告書》（出版資料不詳），頁 16-17。

一種「報德」與「慰靈」的行動。官方則將此視為一件歷史保存與宣揚統治的工作，並願意給予補助，使荒蕪多年的墓地得以重現莊嚴。相關工作 1926 年正式展開，該地區隸屬高雄州下，故行政方面即由作為沖繩子弟的城間恒人掛名主持籌劃。而他除以行政職務督導進行，尚個人捐資五圓以示支持。墓碑設計由高雄州技師和田真負責，施工則由恆春郡役所承擔。舊有的石碑被保留，並在下方增築三層基座，中段特地刻上五十四名死者的姓名，使墓碑從原本的單一追悼符號，轉變為兼具紀念與名錄的「忠魂碑」型式。石材選自臺灣北部士林堅石，碑高達十一尺。修建所需經費約五百圓，其中高雄州補助三百圓，其餘則由沖繩臺灣人會號召旅臺琉人募得。工程歷時一年多，於昭和 2 年 12 月竣工。同年，推動修墓的島袋龜辭世，未能親見完工，但其心願終告實現。

在這一過程中，城間恒人應扮演關鍵角色。作為高雄州內務部長，他是整修工程的行政總責，負責協調經費、設計與施工單位的調度。他的琉球出身身份，使他不僅是一名官員，更是一個象徵性的中介：他一方面代表日本政府行使行政權力，另一方面也代表琉球社群的心聲與情感。這種雙重身分，使他能夠在官方與琉球民間之間搭建橋梁，賦予修墓工程超越單純公務的象徵意涵。城間本人還出資五圓，這不僅是個人善舉，更是表達了他以琉球後裔身份親自參與先人追悼的姿態。

工程完成後，出版《牡丹社遭難民墓碑改修報告書》，將琉球人名單、生還者與救助者家系一併記錄，當中城間的名字被反覆提及，成為這段修建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而該墓碑後於昭和 8 年（1933）依《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列為國定史蹟。



圖 5、改建後的琉球藩民墓樣貌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昭和 2 年 7 月，可能因健康因素或生涯規劃，城間恒人提出休職，地方政商人士如古賀三千人等遂於同年 8 月初，於高雄知名料亭梅屋敷為其舉行歡送會。至昭和 4 年（1929）7 月 25 日，休職期滿，並於同年八月五日因其政務功績而獲「特旨敘位」。然而，他並未重返官場，而於翌年昭和 5 年（1930）7 月 29 日卒於東京，享年四十七歲。

城間恒人自琉球士族子弟出身，後並將戶籍遷於東京，與琉球王族仍維持一定的關係。透過近代教育體系，他逐步進入帝國官僚體制，於南北調動之際，來到了臺灣南部出任高雄州內務部長。在任期間，所涉事務廣及行政、經濟、教育、公共建設、軍事及外交等領域，活動範圍遍布高雄、屏東及澎湖。且在不算長的任期當中，正好以沖繩子弟身分參予了牡丹社事件墓碑的改修指標工程，可謂是因緣際會。綜觀其一生，城間恒人的履歷可謂展現了日治時期沖繩士族出身官僚在帝國體制中所經歷的多重軌跡。



圖 6、擔任臺灣青果同業組合聯合會副組長時期的城間恒人

圖片來源：臺灣青果同業組合聯合會編，《臺灣青果同業組合聯合會創立十年史》，無頁碼。

5、赤嶺直

赤嶺直（1892-?）出身於沖繩縣島尻郡小祿村榮原，畢業於沖繩縣立農學校，早年即受過完整的農業專業訓練，為其日後在臺灣的公職生涯奠定了基礎。

自大正 4 年（1915）至大正 9 年，他在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庶務課與商工課服務，主要參與農政及產業推廣相關業務。大正 10 年（1921）起，轉入高雄州內務部地方課，負責農業生產與農事行政，並主持多項推廣活動，如大正 12 年的「高樹稻作競作會」、大正 13 年的「農業倉庫磋商會」、大正 14 年的「內地種米講話會」。透過這些活動，他展現出將官方政策落實於地方農村的重要角色。¹⁹

其後，赤嶺直歷任於屏東郡役所與恆春郡役所庶務課，工作重點放在農業改良與稻作推廣。他長期參與水稻競作會及相關授賞活動，擔任審查與技術報告的職務，藉由比賽與獎勵制度提升稻作品質，並推廣蓬萊米的種植。²⁰ 在此期間，他也參與昭和 7 至 8 年（1932-1933）潮州郡聯合青年團等社會組織，除技術官僚的身分之外，更成為行政與地方社會動員的中介。

¹⁹ 〈屏東特訊／開磋商會〉，《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10 月 18 日，4 版，夕刊。〈篤農家農事視察〉，《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10 月 23 日，2 版，夕刊。

²⁰ 〈內地種米講話會〉，《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10 月 23 日，1 版，夕刊。〈屏東水稻授賞式〉，《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2 月 28 日，4 版。

昭和 12 年以後，赤嶺直轉任地方行政首長，先後擔任鳳山郡大寮庄長（昭和 12 至 13 年，1937–1938）與鳥松庄長（昭和 14 至 20 年，1939–1945）。²¹ 在這些職位上，他直接負責了高雄地方的基層行政、財務與農業等事務，並與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協作處理土地收入徵收，相關收據留存於昭和 17 年（1942）的檔案中。除此之外，他還推動畜產模範部落活動與農事改良，使其角色由技術官僚轉型為基層治理的核心人物，具體展現高雄農村行政的實際運作。

綜合觀之，赤嶺直作為沖繩出身的農業官僚，服務於臺灣南部，並透過水稻競作會、農業倉庫制度、內地種稻推廣等政策，實際推動高雄與屏東地區農業的商品化與制度化。隨後，他陸續擔任庄長，成為基層治理的實踐者。而在服務高屏期間，他參與青年團、農會、同業組合等社會組織，扮演社會動員的中介角色。甚至其子赤嶺昭雄，亦在高雄就讀於高雄州立高雄中學校，可謂與高雄有甚深的關聯。

赤嶺直長達三十年的職涯，實則反映了一位沖繩籍技術官僚從農技推廣、行政支援到基層治理的演進軌跡。他同也參與了牡丹社事件墓碑改修事件，捐獻一圓。²²



圖 7、赤嶺直之經歷

圖片來源：大園市藏編，《臺灣人事態勢と事業界》，頁 65。

6、上運天（平川）先次郎

上運天先次郎（1894–?）為沖繩出身的通信官僚，自明治末期來臺投身郵電事業，數十年間深耕島內通信行政，並於昭和 15 至 16 年間主持高雄郵政與電信體系。

上運天先次郎生於明治 27 年（1894），原籍沖繩縣島尻郡佐敷村（今南城市佐敷），出身於士族之家。他選擇「通信」這個行政專業作為終身志業，16 歲時於明治 43 年 9 月即畢業於通信傳習所，同年 10 月即任首里郵便局通信

²¹ 大園市藏編，《臺灣人事態勢と事業界》（臺北：大園市藏，1942），頁 65。

²² 《牡丹社遭難民墓碑改修報告書》，頁 15。

事務員，開始其技術官僚生涯旅程，後更在臺灣展開了近三十餘年的仕途。

在任職首里郵便局後，上運天先次郎轉往那霸郵便局，擔任日給通信事務員。雖其待遇獲陸續調升，蛋或為尋求更穩定及更有發展性的天地，他於大正 2 年 4 月辭去在那霸的職務，而於同年 5 月來到臺灣，先是在桃園郵便局起任通信技術員兼通信事務員，並旋即在 12 月通過總督府的通信技手試驗，正式進入臺灣的行政體系。²³

翌年（大正 3 年），他仍繼續任職於桃園郵便局，後轉任至基隆郵便局通信掛服務，擔任通信事務員兼任通信助手，可能因其具有通訊技能，故當總督府在中部山區與原住民部落作戰時，曾調用他至前線支援軍事通信事務。這段經歷應使他更熟悉臺灣中北部的地理與通信線路，也為其後在臺灣各地調任奠定了技術基礎。

當時基隆作為北臺灣重要的海港城市，郵政與電信設施皆處於快速擴張階段，上運天先次郎亦在此穩定發展。然根據山上北雷《半世紀の台湾》所載，因基隆波止場郵便出張所發生會計不正事件，上運天因擔任出張所主任，做為監督者而被牽連其中，雖僅屬「知情不報」，仍被要求辭職，他遂以罹患瘧疾，以致身體健康狀況欠佳的醫生證明為由辭任。²⁴ 幸後續得通信局長廣瀨吉郎與基隆局長瀧均表出面調停，旋即於臺南郵便局復職。此事雖一度中斷仕途，卻未損其專業聲譽，反顯其在同僚間的信任與人望。

自此之後，上運天的職涯穩定發展。自大正 8 年（1919）起，他調任臺南郵便局電信課，繼而服務於淡水、臺北及臺灣逋信局監理課等地，歷任通信書記、技師、書記官等職務，積累了行政與技術並重的經驗。進入昭和初期後，他已成為殖民地通信行政中的熟手官僚。昭和 8 年（1933）7 月，他獲任臺北郵便局郵便課長，主掌全島最繁忙的郵政中心。任內除日常郵務監督外，亦負責郵政金融、為替與保險等附屬事業之運作。如昭和 11 年（1936），他被派任臺灣總督府低利資金調查委員會書記，參與金融政策之研究與執行。²⁵這項任命顯示他已不僅是一名技術官，更是具行政規劃與政策思維能力的高級官僚。

昭和 15 年（1940）3 月，上運天晉升為臺灣總督府交通局副參事，並派任高雄擔任高雄郵便局局長，仕途達到巔峰。²⁶高雄為重要港市，高雄郵便局更是創立於日治初期，後隨高雄的繁盛負擔重要的運輸與通信重責，而他

²³ 「〔通信事務員〕上運天先次郎（通信手ニ任用ノ件）」（1914-12-01），〈大正三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判）第十二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324021X001。

²⁴ 「通信手上運天先次郎（退官）」（1918-06-01），〈大正七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判）第六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888065。

²⁵ 「上運天先次郎（低利資金委員會書記ヲ命ス）」（1936-04-01），〈昭和十一年四月至六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判任官以下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檔案・進退原議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249022。

²⁶ 「上運天先次郎任臺灣總督府交通局副參事、敘高等官七等」，〈昭和十五年三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等官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檔案・進退原議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102170X029。

也兼任高雄州防空委員會幹事。當時高雄正值港市擴張與軍港化的關鍵時期，郵政與防空通信體系的整合成為新任務。上運天在訪談中指出，高雄與臺北間的通信量迅速增長，郵包與航空郵便應相互結合，以形成內外連貫之郵運體系。此構想不僅反映其對地方行政之前瞻性規劃，也折射出昭和期郵政的現代化願景。

除處理繁忙的事務，更因應左營新納入高雄市，上運天積極處理增設出張所事務。左營出張所於昭和 16 年 5 月正式開設，先是改建自舊庄役場，預定翌年再新築百坪局舍，以因應地方需求。此外，在日常業務上，上運天連同同仁，每月執行職員體重調查制度，以掌握健康狀況。同時，他亦關注郵政文化的推展，於昭和 16 年 4 月在《臺灣遞信協會雜誌》發表〈遞信人としての感想〉一文，分享對新發行的國立公園郵票之感想，並論及郵票之美感與國民精神教化的關聯，這篇短文展現了他將通信事業視為國家象徵與文化教育工具的觀點。²⁷

由於當時已經進入戰時，根據《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通信部職員野戰從軍史》記載，當南方派遣通信部隊自廣東凱旋返臺時，上運天也會親赴碼頭迎接同仁平安歸來，象徵他不僅主持地方郵政行政，也在戰時通信補給網中扮演協調角色。其後於 11 月，因行政體制再編與軍事任務轉移，他依願退官，旋即進入臺灣交通協會服務。這標誌著他自官僚體系轉入半官方性質的組織，亦反映當時戰時行政的流動與重組。²⁸ 其後，他改姓為平川，原因不詳。另擔任臺灣勸業無盡株式會社臺中支店店長。²⁹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平川先次郎成為滯留臺灣沖繩籍民社群中的關鍵人物之一。在歸鄉路艱難之際，他積極投入救援與遣返工作，展現出卓越的組織與協調能力。他陸續擔任身兼「沖繩僑民總隊」會長與「臺灣沖繩同鄉會聯合會」副會長，與會長與儀喜宣（1886-1948）、副會長南風原朝保（1893-1957）、川平朝申（1908-1998）等人共同協助安排在臺沖繩人士的安置。如面對約兩千名滯留臺北的沖繩人士，平川等人立即將其安置在遭轟炸的舊臺灣總督府廳舍。為解決糧食困境，平川先次郎展現了其果決的執行力：他不僅設法籌糧供食，更主動奔走，協調各方資源。並曾親赴臺中向日本軍方領取米糧，隨後亦獲得中華民國政府的援助，最終成功協助大批琉球人安全返鄉。這不僅彰顯了他作為領導者的組織與協調能力，更體現了他對同胞的深厚情誼。

儘管失去了原有的官職，平川先次郎仍憑藉其在臺時期累積的行政協調經驗，協助在臺同胞陸續返鄉，後更在戰後初期琉球社會重建行動中擔任中堅力量之一。戰後，平川先次郎繼續投身公共行政與社會事業，成為戰後沖繩通信

²⁷ 上運天先次郎，〈遞信人としての感想〉，《臺灣遞信協會雜誌》，229 期（1941 年 4 月），頁 75-76。

²⁸ 〈上運天先次郎氏（前高雄郵便局長）〉，《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11 月 1 日，4 版。

²⁹ 「商業登記」（1944-12-13），〈昭和 19 年 12 月臺灣總督府官報第 843 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2030843a010。

體系重建的重要推手。由於劇烈的戰爭使沖繩的通信設施幾近全毀，重建復原成為首要之急。

1950 年 4 月 1 日，美軍佔領沖繩群島時期所設置的行政管理機關—沖繩民政府，決定設立郵政廳，以重建郵政與電信為核心任務，平川先次郎受任為首任郵政廳長，統籌全琉通信事業的復興。當時並廢除奄美、宮古、八重山三地的通信部，統一整合各島嶼郵政機構，使琉球群島的通信行政得以脫離戰時分裂體制，得以統籌建構群島內的聯絡網絡。後隨政治體制轉變，郵政廳改制為琉球政府郵政局，平川仍續任首任局長，至 1953 年 3 月 31 日卸任止。其任內首重基礎通信設施之重建與郵遞制度之規範化，確保郵務能在多島嶼環境中順利運行。根據當時立法院特別委員會會議記錄，平川以郵政局長身份出席報告選舉公文傳遞可行性，強調郵政行政對民主制度推行的重要性，並指出戰後居民登錄混亂、地址不明、門牌制度未健全等問題。他建議以市町村與班長系統合作、建立戶籍地圖與住民名簿，以利郵遞與選舉文書之投送，展現其行政務實與制度設計能力。此舉顯示平川不僅著眼於郵務運作層面，更關注行政體系的社會整合功能。

除通信行政外，平川亦積極推動公共媒體與社會教育事業。任琉球放送專務期間，致力於廣播事業制度化及教育宣導節目的開發。³⁰ 進入 1970 年代後，平川轉向社會福祉領域，歷任沖繩縣社會福祉協議會副會長與更生保護會會長，積極推動戰後貧困與孤老救助事業，關注弱勢群體的生活復歸與社區支援體系的建設。其晚年亦設立「平川獎學基金」，資助家鄉佐敷村子弟升學，並推動設立沖繩縣下首座村內有線放送系統，以促進資訊流通與教育普及。

1979 年，佐敷村依據 1977 年制定之《村表彰條例》舉辦第一次村民表彰，平川先次郎名列十位受獎者之一，表彰其「創設平川獎學基金以培育人材，並促成本村首座有線放送設施設立，對教育振興與住民福祉向上貢獻卓著」之功績。此項榮譽不僅肯定其在地方教育與公共建設上的努力，更體現其由技術官僚轉化為公共知識者與社會實踐者的歷程。³¹

值得一提的是，1965 年 7 月，平川先次郎作為琉球訪臺團的一員，與其他 18 位團員一同重返這塊他曾經生活三十餘年的土地。在這為期一週的訪問中，他們不僅拜會了相關政府機構，也參觀了多處工廠設施。³²

其一生橫跨日本帝國、戰後美軍統治與沖繩復歸三個時期，從殖民地通信官僚到自治行政領導者，始終以通信與公共服務為志業。而回顧上運天先次郎在臺灣仕途，可視為日本帝國周邊出身官僚在殖民地行政體制中歷經養成、升遷與轉型的縮影。他以通信專業為立足點，從基層郵務與電信事務起步，歷經地方郵政運作、金融行政管理、政策企劃，乃至戰時通信體系建構等多重領域。尤於昭和 15 至 16 年間主掌高雄郵政與電信體系之際，雖任期短暫，上運天仍

³⁰ 大沢貞吉編著，《台灣關係人名簿》（横浜：愛光新聞社，1959），頁 151。

³¹ 〈第 1 回村民表彰 村勢の向上発展に尽くす功労者 10 人を表彰〉，https://jmaps.ne.jp/nanjo2/det.html?data_id=123785

³² 〈琉球訪華團 一行今來台〉，《聯合報》，1965 年 7 月 7 日，2 版。

積極配合南部都市擴張與戰時體制化的進程，擴充郵電設施與運作架構，推動都市郵政網絡之再編。亦映照出上運天作為出身沖繩士族的技術官僚，在技術理性與政治任務之間，如何遂行國家治理政策。這段行政經驗，亦成為他戰後返鄉參與沖繩地方建設的重要基礎。

7、友利惠任

來自宮古群島的友利惠任，明治 28 年 8 月 6 日生於沖繩縣宮古郡下地村興那霸，此年正是日本取得臺灣統治權的時期。

由於臺灣距離宮古島不遠，且可提供較多就業機會，或為尋求穩定的職業，友利惠任於大正 7 年（1918）11 月左右渡臺，翌年大正 8 年（1919）4 月被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採用。專賣局是沖繩人士來臺任公職的主要單位之一，友立最初在鹽務課擔任勤務。隨後近二十年間，他歷任多處專賣局出張所之書記，足跡遍及嘉南沿海至高雄地區。家庭方面，友利惠任與配偶育有四名子女（二男二女），紀錄稱「家庭至極圓滿」，顯示他在工作之外亦在臺灣築起穩定的生活基礎。³³

自明治 32 年起，臺灣實施食鹽專賣制度，由專賣局統籌管理鹽田的劃定、生產監督、品質檢定、倉庫保管與配給，以及不正流通的管理等。專賣局為有效執行制度，於產鹽區設置出張所，負責鹽田日常監督、鹽品入庫與檢驗、倉儲管理及運銷調度。由於鹽業主要集中在嘉南沿海及高雄一帶，出張所多設於該區域，專賣局人員亦多長期駐守中南部，這直接影響了友利惠任的活動範圍，使其在高雄及嘉南沿岸數年間持續任職，累積了豐富的鹽務管理經驗。

進入鹽務課後，大正 9 年 8 月，他於北門郡出張所初任雇員；大正 10 年至大正 14 年間，轉任職於高雄岡山郡烏樹林出張所，升任為書記。該出張所管理今高雄市永安區的烏樹林鹽田與茄荳區的竹滬鹽田，利用引蟯港內海的海水進行曬鹽。大正 15 年（1926）至昭和 6 年（1931）期間，他轉至彰化郡鹿港出張所擔任書記；昭和 7 年（1932）至昭和 10 年（1935）間，則在嘉義石郡布袋出張所擔任書記，持續其鹽務管理工作。

友利惠任長期服務於中南部鹽務出張所，其工作包括巡視鹽場、定期提報產量與銷售量、鹽田開設調查、屋舍修繕與生產設備之管理維護等各式繁瑣的項目。其職涯體現鹽業專賣制度的運作，也在嘉南沿海留下穩健而踏實的足跡，在異鄉的土地上，留下默默但不可或缺的足跡。

³³ 福田廣次，《專賣事業の人物》（臺北：臺灣實業興信社，1937），頁 162。



圖 8、友利惠任

圖片來源：福田廣次，《專賣事業の人物》，無頁碼。

8、神村孝太郎

神村孝太郎（1897 年 6 月 30 日－1988 年 6 月 28 日），出生於沖繩縣具志川間切天願一帶，出身世代為地頭代的家族，屬地方具影響力的領導階層。其父神村吉郎（1867－1942）活躍於政治與實業領域，並曾當選衆議院議員。

大正 7 年（1918），神村赴日本本土，入讀熊本高等工業學校（今熊本大學工學部前身），於大正 10 年畢業，取得工學得業士資格。畢業後，他曾於鐵道省及廣島市等機構任職，累積實務經驗。³⁴ 然而，他真正職業生涯的核心舞台，卻是在臺灣。

由於沖繩出身的照屋宏長期任職於臺灣總督府鐵道部，並逐步成為部內的重要成員，他遂成為引介同鄉赴臺服務的重要橋樑，使家鄉人才得以在臺灣建設舞台上發揮所長。³⁵ 神村孝太郎亦在此脈絡下，於大正 15 年 9 月進入鐵道部，最初擔任工務課技手，負責鐵道維護與改良。其後十餘年間，他歷經工務課、改良課與建設改良課等關鍵部門，深度參與臺灣鐵道運行與基礎建設的規劃與推進，並在專業領域中逐步奠定地位。³⁶

昭和 12 年，神村升任改良課高雄改良事務所所長，並晉升技師。昭和 15 年前後，他歷任庶務課、建設改良課、自動車課等單位，涉足行政、工程與運輸等多元領域。並因應高雄市的擴張，負責新建位於今市區處的高雄車站之重大業務，以達成貨物與人流的分流與建設交通新樞紐。其在高雄的任職，使他逐漸參與地方交通與港灣事務。昭和 18 年（1943），他以技師身分列席高雄港灣協會理事會，反映其影響力已超越鐵道，擴展至港灣與區域交通發展。³⁷ 昭

³⁴ 〈復歸をひかえる沖繩の土木技術者たち〉，《土木学会誌》，56：12（1971 年 12 月），頁 82。

³⁵ 又吉盛清，《大日本帝国植民地下の琉球沖繩と台湾：これからの東アジアを平和的に生きる道》，頁 235-245。

³⁶ 又吉盛清，《大日本帝国植民地下の琉球沖繩と台湾：これからの東アジアを平和的に生きる道》，頁 246。

³⁷ 〈港灣協會理事會〉，《臺灣日日新報》，1943 年 4 月 24 日，4 版。

和 19 年（1944），他獲授從五位官階，象徵其職涯達到高峰，承擔南部交通樞紐的重大工程責任。

除專業領域外，神村亦活躍於社群組織，曾為臺灣技術協會會員，並於戰後出任高雄沖繩同鄉會會長，展現其在專業成就之外，亦維繫著社群連結與領導角色。

隨著太平洋戰爭末期戰況急轉直下，神村的工作轉而集中於軍事撤退準備工程。終戰時，他在高雄鐵道事務所迎來戰局落幕。戰後，因「琉球籍技術人員」的身份，他一度被留用。但 1946 年 12 月，他主動提出返鄉申請，經鐵路管理委員會高雄辦事處協助上報後，獲准離臺，結束將近二十年的臺灣技術官僚生涯。³⁸

返抵沖繩後，神村積極投身重建與公共事務。戰後不久，他成為琉球政府首任工務局長，隨後又任交通部次長。1956 年晉升為第三代行政副主席，進入政策決策核心。³⁹ 1957 年，他以琉球貿易親善訪華團團長身份重返臺灣，促進經貿交流。⁴⁰ 1959 年起，他出任琉球電信電話公社首任總裁，並兼任琉球電力公社理事、琉臺貿易社長等要職。1970 年代，他又參與沖繩放送協會（後併入 NHK）的籌設與管理，持續在公共事業領域發揮影響力。由於其深厚的高雄經歷，他也成為少數兼具臺灣與沖繩公共建設經驗的代表人物。⁴¹

神村孝太郎於 1988 年 6 月 28 日辭世，享壽 91 歲。他的一生展現了一位沖繩出身的專業技術者，如何跨越地域疆界，在臺灣鐵道建設與高雄交通發展上奠立基礎，並將此資歷轉化為戰後琉球政府任用的重要資本。從歷史角度觀之，他既是跨地域技術官僚的典型，也是沖繩菁英在二十世紀東亞社會轉型過程中，將專業技術、公共行政與地方領導結合的縮影。其在高雄的歲月，更具體體現了沖繩專業人才於臺灣近代交通發展史中的角色與貢獻。

³⁸ 「鐵路管理委員會高雄辦事處琉球籍神村孝太郎請求遣返案」（1946-11-11），〈日韓僑遣送〉，《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307260003012。

³⁹ 〈復歸をひかえる沖繩の土木技術者たち〉，頁 82。

⁴⁰ 〈琉訪華團昨賦歸 神村及國場機場談話 願促進貿易交流文化〉，《聯合報》，1957 年 6 月 20 日，2 版。

⁴¹ 編集部，〈復歸をひかえる沖繩の土木技術者たち〉，《土木学会誌》56：12（1971.12），頁 82。



圖 9、晚年的神村孝太郎

圖片來源：編集部，〈復歸をひかえる沖縄の土木技術者たち〉，頁 82。

9、與儀喜助

與儀喜助，明治 19 年（1886）8 月 8 日出生於沖繩縣島尻郡高嶺村大里字，於當地完成小學教育。明治 42 年（1909）4 月 23 日，他自沖繩渡海來到臺灣這個異鄉，展開新的人生。

明治 43 年 2 月，與儀開始進入公職生涯，他先是到新竹廳財務課任職，起初為臨時雇員，日給 80 錢。然同年 3 月即轉為較穩定的編制內雇員，月俸 25 圓。期間，他於大正 2 年完成稅務員養成規程之修習，取得正式資格，後獲任新竹廳稅務吏。在新竹服務十餘年間，與儀歷任稅務課吏員與屬員，積累豐富經驗，並逐步於公職系統內穩定發展。然在大正 9 年，一度因病申請退休。其病因包括既往的傷寒、肋膜炎，及來臺後染上的瘧疾等，種種疾病，導致體力衰弱所引發的神經衰弱。⁴² 然而同年，他旋即轉入高雄州，再度回到公職領域，起初服務於屏東稅務出張所，並於大正 15 年 3 月升任高雄州知事官房稅務課直稅係主任。至此，與儀已由基層雇員躍升為能承擔核心業務的官僚，薪資與職責亦有明顯提升。昭和 3 年（1928），他奉派赴日本各地稅務轄區考察，不久後依願退官，並獲恩給 448 圓，轉向實業經營。⁴³

或因嗅到新興產業的發展，加上自身在東港地區的觀察所見，辭官之

⁴² 「〔新竹廳屬〕與儀喜助（賞與、退官）」（1920-05-01），〈大正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判)第五卷之一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3103015。

⁴³ 「昭和九年七月煙草賣捌人暨匿名組合員履歷書與儀喜助」（1934-07-01），〈昭和九年七月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公文類纂煙草賣捌人暨匿名組合員履歷書〉，《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103459153。

後，與儀喜助戶籍雖在高雄市鹽埕町二丁目（今鹽西里一帶），但其選擇以東港作為發展重心。該地為漁業重鎮，漁獲保存亟需製冰技術支援。昭和 4 年，他發起籌組東港製冰株式會社，翌年正式創立並出任常務取締役，掌理營運。該會社利用東港後寮仔溪水源製冰，以供應日益繁盛的漁業需求。為籌設該公司，他除邀集東港信用販賣購買利用組合長暨醫師許白土（1903—1962），並邀請高雄資產家「仲護商行」張仲護（1897—？）、富商陳中和（1853—1930）之子陳啓清（1903—1989）等人共同出資，於昭和 5 年設立製冰工廠。同年，與儀亦取得專賣局煙草賣捌人之資格。⁴⁴ 此外，他亦購置東港地區之官有土地，以進行經營。⁴⁵

除工商活動外，與儀亦投身公共事務。潮州線鐵路雖於大正 12 年建成通車，但僅延至溪州（今南州），未能銜接沿海要地。東港作為南部漁業與商業重鎮，地方人士遂多次陳情推動鐵路南延。昭和 10 年，陳秋金、李幾法等臺籍仕紳即與與儀喜助共同倡議，向高雄州廳及臺北交通局陳情。⁴⁶ 此外，與儀亦投入後續的東港築港請願運動。他的參與，不僅彰顯其在地方社會的領導地位，也反映他超越個人事業，關注基礎建設與區域發展之需求。同時，他擔任東港信用販賣購買利用組合理事，協助地方金融與消費組織的健全運作。進入昭和戰時期，與儀又歷任東港郡街漁業組合、東港郡漁業協同組合及東港郡漁會之組合長與會長，參與漁業組織的整合與轉型。與儀喜助在臺灣生活至戰爭結束，但隨著政權轉換，與儀之股份及土地應有部分，便均由國有財產局接管。

家庭方面，與儀喜助之妻為與儀エイ（1897 年生），另育有一子孝明（1909 年生）。私人生活中，他嗜好圍棋與狩獵，顯示即使身處繁忙公務與企業經營，他仍保有休閒自適之道。⁴⁷

總觀與儀喜助的一生，其軌跡映照了日治時期官僚體制與地方資本發展的交錯。他早年作為基層稅務官吏，參與制度建置與執行；辭官之後，則成為地方實業的參與者與經濟組織的推手。他的經歷既是個人仕途的轉折，也是臺灣地方社會變遷的縮影。他的足跡連結了沖繩與臺灣、官署與企業。透過散見於檔案的零碎記錄與履歷，可以看見他如何在島嶼邊陲的縫隙中，奮力追尋生存可能，留下低沉而真切的生命軌跡。

⁴⁴ 「昭和九年七月煙草賣捌人暨匿名組合員履歷書與儀喜助」（1934-07-01）。

⁴⁵ 「官有地無償貸下ノ件（與儀喜助）」（1930-01-01），〈昭和五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五卷警察外事內務〉，《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7389023。「官有地土地及水面使用許可ノ件（與儀喜助）」（1930-01-01），〈昭和五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六卷內務〉，《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7390004。

⁴⁶ 〈歎願官線 迂迴至東港〉，《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4 月 2 日，4 版，夕刊。

⁴⁷ 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日刊一週年紀念出版）》（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二版），頁 186。



圖 10、《臺灣人士鑑》中對與儀喜助之介紹

圖片來源：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日刊一週年紀念出版)》，頁 186。

10、與儀喜宣

畢生致力於水產行政的與儀喜宣，堪稱日治時期臺灣最具代表性的沖繩籍技術官僚之一。其任職歷程，照應出戰前日本與臺灣之間的技術官僚的流動軌跡，高雄則成為與儀職業生涯後期的重要活動舞臺與專業實踐空間。

與儀喜宣為沖繩縣島尻郡具志頭村人，出身於士族階層。明治 39 年，與儀自沖繩縣立中學校畢業後，旋即入東京水產講習所就讀。該校為日本近代水產教育體系之核心機構，亦為培養臺灣水產技術人才的主要搖籃。明治 42 年，與儀畢業於本科漁業科，並於大正元年修畢遠洋漁業科課程及相關技術實習。此一完整而正統的近代水產教育歷程，使其兼備理論與實務之專業素養，成為具備高級技術能力的水產專家，為其日後歷任地方與中央水產行政要職奠定堅實基礎。

自大正初年起，與儀陸續任職於富山縣、島根縣等地方行政機關，歷任水產試驗場技師、場長及講習所長等職。期間並被派赴歐美與非洲考察水產制度與遠洋捕撈技術，也在西伯利亞出兵事件中被派往北方調查，累積了豐富的國際事務經驗。其後調任農商務省（後改農林省）技師，進入中央官僚體系。此階段的歷練，使他熟稔國家水產行政之制度運作，並培養出兼具技術與行政能力的跨區域專業身分。⁴⁸

昭和 3 年 7 月，與儀自農商務省轉任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技師，投入臺灣水產行政體系，正式展開其長達十年餘的臺灣服務歷程，並為臺灣水產事業的制度建構與技術推展注入了新的專業力量。⁴⁹此時臺灣水產行政正逐步走上制度

⁴⁸ 「與儀喜宣任總督府技師、俸給、勤務」(1928-07-01)，〈昭和三年七月至九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等官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檔案·進退原議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053004。

⁴⁹ 「與儀喜宣殖產局水產課勤務ヲ命ス」(1929-05-01)，〈昭和四年四月至六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等官進退原議〉，《臺灣總督府檔案·進退原議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

化，與儀負責統籌漁業調查、試驗研究與教育訓練等，至昭和 14 年（1939）其以健康因素申請退休前，他兼任殖產局水產課與試驗場多項職務，並主持水產試驗場長與水產講習所（今國立基隆海事職業學校之前身）。其在任期間推動的沿岸漁業改良、底曳網制度導入及船員養成計畫，對臺灣海洋產業之近代化影響深遠。

除行政職務外，與儀亦活躍於總督府諸多專門委員會，如「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調查會」及「臺灣船員保險審查會」等，顯示其專業已超越技術層面，進入制度規劃與社會政策領域。另值得一提的是，他與中村廣司合作，調查臺灣高山冷水域的魚類生態，並於昭和 13 年（1938）共同發表《臺灣高地產鱒——天然紀念物調查報告第五輯》，其中即記錄了臺灣特有魚種「櫻花鉤吻鮭」，這份報告成為臺灣鮭魚早期研究的重要文獻。

完整的經歷，讓與儀累積了豐富的行政經驗與專業聲望。並因其在臺灣位居要職，使與儀被視為沖繩人仕途成功的象徵，時人稱之為「在臺沖繩人之出世頭」。據當時輿論，臺灣水產業各項政策推行「若無與儀首肯，寸步難行」，足見其影響力之深。尤為可貴者，他終生不隱其琉球出身，拒絕改籍或改姓，顯示其在帝國體制中仍維持鮮明的地方認同。⁵⁰另其並無子女，本身趣味則為謠曲。⁵¹

隨著日本「南向政策」的推進，南中國海與東南亞地區被視為資源開發與軍政推進的前緣，日本政府透過軍方行動與行政機構之部署，逐步將南洋地區納入以日本為核心的經濟圈。如昭和 14 年 3 月，日本軍方進駐南沙群島並將之改稱「新南群島」，隨後臺灣總督府於 3 月 30 日將該地行政上劃入高雄市轄區。此舉除具地緣戰略意義外，亦標誌著以臺灣為基地的企業體系將成為南向經營的重要支點。

為因應官方戰略轉換，作為官方出資的國策企業，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亦將其業務範圍擴展至外洋經營。在此背景下，拓洋水產株式會社於昭和 14 年正式成立，成為臺灣拓殖株式會社（臺拓）體系下專責南海漁業開發的核心企業。其創立反映出戰時經濟動員體制下的產業戰略，且隨著拓洋水產的設立，高雄遂成為與儀喜宣於臺灣職涯後期的重要活動據點與專業實踐中心。

拓洋水產的相關規劃至晚在昭和 13 年便已開始，該年 9 月 23 日的《臺灣日日新報》即以〈南海を漁場とする 國策拓洋漁業會社 臺拓中心に創立準備中〉為標題揭示國策水產會社的成立進程，顯示拓洋水產自構想階段起，即被定位為配合官方南向政策的產業機構。⁵²

進入昭和 14 年初期，拓洋的籌備作業趨於具體化。《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00010056068X009。

⁵⁰ 又吉盛清，《大日本帝國植民地下の琉球沖繩と台灣：これからの東アジアを平和的に生きる道》，頁 131。

⁵¹ 谷元二編，《大眾人事錄》第 13 版（東京：帝國密秘探偵社，1940），頁 72。

⁵² 〈南海を漁場とする 國策拓洋漁業會社 臺拓中心に創立準備中〉，《臺灣日日新報》，1938 年 9 月 23 日，2 版。

14 年 1 月 29 日刊出〈拓洋漁業も 本據は高雄 鮪専門に南海で活躍〉，指出企業的產業方向（鮪魚為主要高經濟魚種），亦顯示高雄被視為南向經營的核心節點。⁵³而歷經半年籌備後，拓洋水產於昭和 14 年 6 月正式成立，公司資本金為 200 萬圓（共 40,000 股），屬臺拓體系之子會社。該公司為戰時體制下少數具有跨企業與跨地域協作性的水產企業之一，由臺拓提供行政與資本基礎，日本水產株式會社則提供遠洋漁業技術支援。

拓洋水產本社設置地之選定，初期曾於臺南與高雄兩地間進行評估，最終決定以高雄為本社所在地。《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4 年 8 月 31 日刊載〈拓洋水產高雄に本社開設〉一文，指出：「拓洋水產自創立以來，暫以本社事務所設於臺北市榮町之臺拓本社內，今將於九月二日於高雄市鹽埕町三之一起設本社事務所。」此舉象徵公司正式由臺北（行政中心）移至高雄（產業與南進門戶），以強化其南向經營的實質部署。作為南部重要軍港與工業都市的高雄，憑藉其優越的地理位置與完善的港灣設施，成為通往新南群島、西沙群島乃至東南亞洋面的前進據點。同時，高雄亦具備水產加工與運輸之有利條件，使該決策兼具戰略性與實務性考量。同年 11 月，《臺灣日日新報》再度報導拓洋水產舉行「揭幕宴會」之消息，顯示公司組織體系與營運網絡已於當年度完成建構。

綜觀其籌備至落實的過程，拓洋水產之設立並非單一企業的自主經營決策，而係戰時體制下官方政策導向所促成的制度性產物。拓洋的事業藍圖延續自臺拓的整體產業策略。根據當時之政策文件與新聞資料，其主要任務包括：以新南群島為前進據點，設置港灣、補給、水源、冷藏及加工設施；開發南中國海至東南亞海域，以鰹、鮪等高經濟價值魚種為主要捕撈目標；與臺拓系統內其他子會社協同經營，例如開洋燐礦株式會社於西沙、南沙之礦產開採，形成「礦業—漁業—運輸」一體化經營模式。

拓洋的成立，體現了 1930 年代末期日本在南海推行的海洋經濟戰略，也顯示出高雄成為南向經營與海洋開發的核心據點。透過拓洋水產的個案，可觀察到國策企業在政策目標與市場行動之間的連動關係，以及高雄作為「南進門戶」的功能逐步具體化。

故為引入具實務經驗的專業人才進入拓洋水產，總督府安排了長期處理水產相關事務的與儀喜宣加入該會社。《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4 年 5 月 3 日報導指出：「日前自官職退任之前府水產講習所長兼水產試驗場長與儀喜宣氏，內定就任即將創立之拓洋漁業株式會社專務取締役。」⁵⁴而與儀正式的職位如昭和 14 年 6 月 2 日報導所指出：「拓洋水產株式會社於六月一日上午十時在臺拓會議室召開臨時股東總會，出席者計十一名，會中選任與儀喜宣為專務取締役，中村俊吉為常務取締役。」⁵⁵即由與儀喜宣負責管理整個公司整體業

⁵³ 〈拓洋漁業も 本據は高雄 鮪専門に南海で活躍〉，《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1 月 29 日，5 版。

⁵⁴ 〈與儀技師拓洋漁業入り〉，《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5 月 3 日，2 版。

⁵⁵ 〈拓洋水產會社 一日臨時總會役員改選〉，《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6 月 2 日，2 版。

務。在任職期間，時可見與儀往來於臺北與高雄之間。

此一人事安排反映了公部門與國策企業間的人才流動機制——即技術與行政經驗由官僚體系轉入企業組織的現象。與儀的加入，使拓洋在海洋調查與技術規劃方面獲得制度化優勢，並加速其於南海區域建立水產基地與遠洋捕撈體系的進程。此外，與儀亦以拓洋專務身份，兼任高雄州水產會評議員，參與統整地方水產政策的任務。而他亦在日治末期，仍擔任臺灣船員保險審查會委員、臺灣底曳網水產組合高雄支部理事組合長等職務，顯示其在水產與船運相關領域仍維持相當影響力。

在昭和 17 年 1 月，與儀又參與依據《臺灣水產統制令》設立之官方統合指定會社——新高水產株式會社的創設事務，並出任董事一職。

在行政與國策推進間，與儀喜宣的轉變可謂具有高度代表性。除長期擔任技術官僚，其專業知識與行政經驗並讓其在國策企業領域得以被調配運用，顯示出地方技術菁英在政策體制內部所展現的能動性。在此職涯轉折之中，與儀喜宣從官府的行政走向企業的實務，從臺北的行政中樞南下至高雄的港口都市，其個人行動軌跡實則折射出殖民體制下知識與權力之再編過程，高雄並成為其專業理想與國策實踐交錯的場域。

隨著日本統治的終結，與儀喜宣在臺灣的任職生涯亦告一段落，然而，他的歷史角色並未因此中斷。戰後初期，臺灣成為日本帝國崩解後的過渡空間，大批滯留的沖繩移民陷入無所依歸的困境。正是在這樣的動盪局勢中，與儀以其行政經驗與社群威望，挺身而出，成為戰後沖繩群體遣返事務的核心領導者。

56

當時約有三萬名沖繩人士留在臺灣，除原居於臺灣者，並包括大量戰時疏散的平民、由南洋撤退的軍人或隨軍勞動者。雖然沖繩與臺灣在戰前同屬日本統治，但戰後複雜的政治因素，致使這批琉球人陷入身份未明、遣返無門的境地。在此背景下，與儀喜宣被推舉為「沖繩同鄉聯合會」會長。該會是戰後在臺琉球人最重要的自治組織，肩負三項主要任務：其一，負責滯留琉球人的登記造冊，建立完整名冊，此舉成為官方遣返作業的核心依據；其二，調度物資與醫療等人道援助，以協助戰敗後生活困頓的族人；其三，代表社群與中華民國政府協調遣返事宜，確保返鄉程序得以有序推進。此外，副會長南風原朝保及七個分區同鄉會的代表者及兩個支部長等人亦在組織運作上提供關鍵協助，在混亂的時局中，形成具有自治功能的暫時性治理架構。⁵⁷

與儀一方面運用自身長年的行政經驗與新統治者交涉，另一方面則積極整合分散各地的沖繩籍民，並運用如《臺灣新生報》等報刊發佈公告之各類方式，召集滯臺琉球人登記與集中。此舉有效促成大規模遣返作業的展開，使成千上萬名琉球人得以在戰後混亂中安全返鄉。與儀的努力不僅緩解了戰後臺灣社

⁵⁶ 又吉盛清，《大日本帝國植民地下の琉球沖繩と台湾：これからの東アジアを平和的に生きる道》，頁 387。

⁵⁷ 中村春菜，〈戰後台湾における沖繩籍民の引揚げの様相〉（沖繩：琉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博士後期課程，平成 29 年度博士論文），頁 46。

會的接收壓力，也為琉球人群體的社會重建奠定基礎。⁵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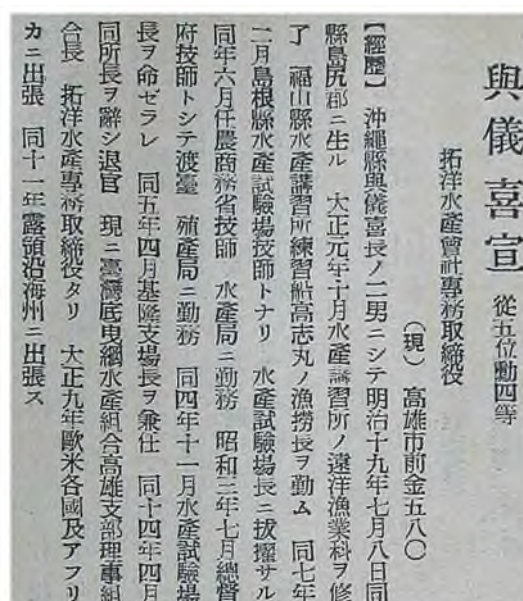
返鄉後，基於其專業背景與行政聲望，與儀喜宣一度被推薦出任沖繩民政府水產部長、海洋學校校長及水產聯合會會長等職。然而，他於 1948 年 5 月病逝，未能在戰後復興期持續發揮其專業與領導影響。儘管如此，他在戰後初期為琉球人遣返所作的貢獻，仍具有無可取代的歷史意義——他以理性、秩序與行政能力，為處於戰敗邊緣地帶的同鄉群體確保了返鄉的權利與尊嚴。

從明治期的專業養成，到行政體系下的技術推展與歷練，再至戰後難民治理與社群組織的領導，與儀喜宣的一生充分展現出沖繩人作為「帝國邊陲的技術中介者」的典型軌跡。他不僅是一位專業官僚，也是在戰後秩序重建過程中承接技術理性與人道實踐的關鍵人物。而高雄，則成為其離開臺灣前最後的重要專業實踐場域，見證他在國家政策與地方社會之間持續調適與行動的歷程。



圖11、與儀喜宣

圖片來源：《臺灣人士鑑》



⁵⁸ 中村春菜，〈戰後台灣における沖繩籍民の引揚げの様相〉，頁 43-45、111。

圖12、《臺灣人士鑑》中與儀喜宣之經歷介紹，可見其住於當時前金地區。
圖片來源：《臺灣人士鑑》

（二）司法從業人員

高雄地區的法院制度可追溯至明治 29 年設立的鳳山地方法院。當時，臺灣總督府為推行日本司法制度，依據《臺灣總督府法院條例》於同年 7 月 15 日設立該法院。其後，其後機關雖偶有更迭，但確實提供沖繩籍司法人員發揮的場域。以下即選擇花城長昱與高嶺方美（1883–1943）略作介紹。

1、花城長昱

花城長昱出生於琉球王國被改制為沖繩縣不久的明治 14 年 5 月 25 日，戶籍地為沖繩縣八重山郡石垣村宇新川八番地，士族出身。他在日治時期的臺灣司法體系中擔任多個重要職務，特別是在高雄地區的服務。

花城長昱早年投身教育事業，曾任教於沖繩現八重山郡大川尋常小學校、兼任八重山島高等小學校訓導、那霸區高等小學校訓導、八重山郡竹富尋常小學校訓導兼校長，以及東京市山伏町尋常小學校訓導等職務。這段經歷顯示他在教育領域的深厚背景，並為日後轉入司法界奠定基礎。

大正 12 年，花城長昱進入臺灣總督府法務部民刑課擔任囑託，開始其司法生涯⁵⁹，不久後即正式展開在司法界服務的歷程。⁶⁰ 其後，他歷任臺北地方法院、臺南地方法院、嘉義支部、宜蘭支部等地的判官，累積相當豐厚的經驗。昭和 9 年至 11 年間，花城長昱調任至臺南地方法院高雄支部，參與高雄、屏東與澎湖等地區的司法審判工作。⁶¹

然為因應南臺灣的行政與經濟發展需求，大正 14 年 7 月 1 日，臺南地方法院於高雄設立高雄出張所，負責土地登記與部分司法業務。期間隨著高雄地區人口增長與城市化進程推進，該出張所於昭和 8 年（1933）3 月 15 日升格為臺南地方法院高雄支部，開始正式受理民事與刑事案件，並負責管轄高雄州及澎湖廳等地。隨後，在法制日漸完備與司法行政需求擴大之下，高雄支部於昭和 15 年 12 月 20 日再度升格為「高雄地方法院」，成為獨立的地方法院機關，標誌著高雄作為南臺灣重要都市的地位亦在司法體制上獲得相應提升。花城長昱正是在這一司法機構演變的重要時期擔任要職，以專責裁決當地各類民事與刑事案件。

至昭和 11 年，他在全島性的司法人員輪調之際，選擇退休。⁶² 而他退任

⁵⁹ 「花城長昱解囑」（1924-12-01），〈大正十三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判)第六卷乙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3863113。

⁶⁰ 「花城長昱（司法二關スル調査事務ヲ囑託ス）」（1923-07-01），〈大正十二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判)第四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3752023。

⁶¹ 新高新報社編，《臺灣紳士名鑑》（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頁 26。

⁶² 〈高雄花城判官勇退を契機に 全島のに斷行〉，《臺南新報》，1936 年 10 月 11 日，2 版。

後，仍選擇在高雄山下町開業擔任律師，延續其與地方的關係⁶³，其執業資格並持續至日治時期結束。⁶⁴ 而他也申請今高雄市六龜區新威一帶土地承攬，用途不詳。⁶⁵ 戰後返歸回沖繩後，花城長昱仍持續執業。

花城長昱在高雄支部任職期間，不僅參與支部升格地方法院的準備與過渡，亦為日治時期高雄司法體系的制度化與常態化運作貢獻心力。回顧其生涯，作為出身沖繩八重山群島的士族知識人，花城的司法歷程展現了其跨越沖繩與臺灣的歷史軌跡，也讓我們得以理解沖繩人士在日治臺灣司法領域中所扮演的專業與制度性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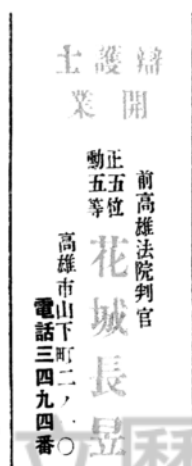


圖 13、花城長昱開業廣告

圖片來源：《臺南新報》，1937 年 1 月 5 日，1 版。

2、高嶺方美

日本統治時期，高雄地方法院的首任院長並非出身日本內地，而是一位來自沖繩八重山郡石垣島的司法官—高嶺方美。

高嶺出生於明治 16 年 2 月 18 日，作為一位離島出身的知識份子，他的一生是一段跨越地域、職業與制度邊界的歷程，從教育者轉身為司法官，從石垣島走向東京，再從帝國心臟投身臺灣。他既是明治以降琉球社會向現代轉型的產物，也是大日本帝國統治機構中不可忽視的建制者之一，尤以於昭和 15 年出任高雄地方法院首任院長，深具意義。

高嶺於明治 37 年自沖繩師範學校畢業，先任職於八重山大川尋常小學，擔任教諭；後旋即調任東京，擔任東京市練成尋常小學訓導，接著又歷任沖繩本島宜野灣、大濱與石垣等地小學校長，具有相當完整的教職歷練。然而，在歷經十餘年教育服務後，高嶺於大正 5 年（1916）毅然辭職，志向法學，進入中央大學法科深造。大正 8 年（1919），他以成績優異畢業，榮獲銀時計賞，

⁶³ 〈花城長昱氏（退職判官）〉，《臺灣日日新報》，1936 年 11 月 4 日，5 版。

⁶⁴ 「辯護士名簿登錄」（1945-07-23），〈昭和 20 年 7 月臺灣總督府官報第 996 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2030996a004。

⁶⁵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110111 年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鳳山地政事務所日治時期檔案文物普查建檔第四期計畫」（2020），頁 51。

同年成功通過日本帝國首次實施的檢事登用第一回試驗及辯護士考試，被認為是具備卓越潛力的法曹新星。12月即被任命為司法官補，旋即於大正10年7月升任判事，9月即派任至臺灣總督府法院，展開他長達二十餘年的司法生涯。

高嶺方美奉派來臺任職以來，歷經臺北、臺南、新竹等地法院，長年累積審判實務與法院行政經驗。昭和8年（1933）12月，晉升為臺灣總督府高等法院覆審部部長補，昭和12年8月調任新竹支部合議部部長。翌年5月，新竹地方法院自臺北地方法院獨立設置，高嶺隨即獲選為該院首任院長。此一任命不僅體現其司法資歷之深厚，也突顯其於法院制度轉型期所擔當之穩定角色。

昭和15年12月20日，高雄地方法院脫離臺南地方法院支部體制，正式獨立為地方裁判機關。此一機構調整，回應了地方司法量能需求的日益擴張。實際上，自大正13年起，高雄僅以「臺南地方法院高雄出張所」名義設置，負責土地登記事務。昭和8年（1933）升格為臺南地方法院高雄支部後，方始承辦民、刑事案件³。但隨著1930年代後期高雄都市化迅速發展，行政地位與經濟重要性同步提升，設置獨立法院已成地方與官廳雙方共識。

新設之高雄地方法院，其管轄區域涵蓋高雄州全境與澎湖廳，即今高雄、屏東、澎湖地區。除常設院區外，尚於岡山、鳳山、旗山、東港、潮州、澎湖等地設立土地登記出張所。此舉使法院不僅具備審判功能，更兼具不動產登記行政責任，標誌著地方司法機能之擴充與基層行政制度之重整。在此制度轉折的關鍵時刻，高嶺方美奉命出任高雄地方法院首任院長。據《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5年12月21日報導：「司法官異動發令，新高雄法院長は高嶺氏」，其人事任命不僅展現官方對其長年司法表現的信任，也象徵總督府對高雄地方法院制度化運作的高度重視。高嶺並非制度創建的设计者，卻是其行政實施的第一位責任者，其任務乃是將高雄法院由紙上制度落實為具體機構，確保新設法院得以順利承接原支部業務，並持續擴展服務效能。

任內，高嶺積極推動法院業務之整編與地方司法網絡之擴展。自昭和16年（1941）起，他多次巡視轄區內澎湖、岡山、潮州、東港等地，親自指導土地登記與民刑訴訟程序之運作，將司法服務深入基層，亦強化總督府對地方司法之統合與掌握。

高嶺在高雄任內僅一年餘，即於昭和17年2月榮調臺灣總督府高等法院上告部判官，返駐臺北，躋身於臺灣法界最具崇高地位的司法官之列。然而，同年12月22日，他自高等法院退職，為其二十餘年的司法生涯劃下句點。未及一年，於昭和18年（1943）5月13日凌晨0時40分，高嶺病逝臺北。根據總督官房法務局發行之《臺法月報》記載，其葬儀於翌日5月14日假臺北市東門町曹洞宗別院舉行。⁶⁶ 高嶺人生後半的高峰幾乎全在臺灣度過，堪稱

⁶⁶ 〈高嶺判官卒去〉，《臺法月報》，37：7（1943年7月），頁59-61。

沖繩與臺灣之間交流與連結的重要見證者之一。

（三）醫事人員：宜保之春

宜保之春為日本沖繩縣出身之醫師，生於明治 38 年（1905）。其職業生涯跨足沖繩、日本內地、臺灣東部與南部，其醫療實踐歷程展現出官方體制下專業人士的流動性與多重性。日治時期醫療體制中的沖繩籍醫師與高雄醫療發展之關聯，甚可以宜保之春為例。

宜保在日本本土接受初步教育後，於大正 14 年來臺進入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並於昭和 6 年畢業。畢業後進入該校研究科深造，並同時於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任職，開啟其臺灣醫療服務之路。昭和 7 年 10 月起，宜保之春赴中國福州，在博愛會醫院擔任眼科醫員。該年 11 月取得臺灣總督府醫師執照後，次年轉任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技手，參與衛生行政工作，為日治臺灣的公共衛生政策實踐貢獻專業力量。⁶⁷

自昭和 12 年起，宜保之春於花蓮港地區從事醫療服務，擔任花蓮港醫院醫官補，並兼任臺北刑務所花蓮港支所之囑託醫師，任期持續至昭和 16 年。在此期間，他不僅從事一般醫療服務，亦參與監獄醫療，展現了醫師於不同機構之間的多重角色。

昭和 16 年，宜保之春晉升為臺灣總督府醫院醫官，並被派至高雄醫院擔任眼科醫師。⁶⁸ 當時的高雄醫院位於山下町三丁目，即今鼓山區山下里東西二巷一帶，為當時南部最具規模之總督府直轄醫療機構，設有內、外、眼、小兒、婦產等、耳鼻喉等科別，昭和 16 年時病床共有 143 床。其眼科業務是區域醫療的重要支柱，宜保在此不僅承擔醫院日常診療，亦投身於地方公共衛生事務。特別是昭和 18 年（1943），他以高雄醫院眼科醫長身份，前往旗山、美濃、甲仙等地，為 64 名失明患者進行診斷檢查，其中有半數被認定可經由手術而恢復光明，並即安排入院接受治療。這項診療行動雖與戰時動員體制有密切關聯，但同時也使專業眼科醫師能將公共醫療資源引入地方，推動眼疾防治與健康宣導，藉此提升群眾對眼部疾病的認識與防範。綜觀其醫學生涯，宜保之春不僅深耕於眼科專業，更將臨床診療與社會公共性結合，體現了醫師在專業實踐與社會責任之間的互動。

其妻子為宜保久子，並育有二女，個人興趣則包括讀書、爬山健行與音樂。

69

⁶⁷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頁 108。

⁶⁸ 〈宜保之春氏〉，《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10 月 1 日，4 版。

⁶⁹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頁 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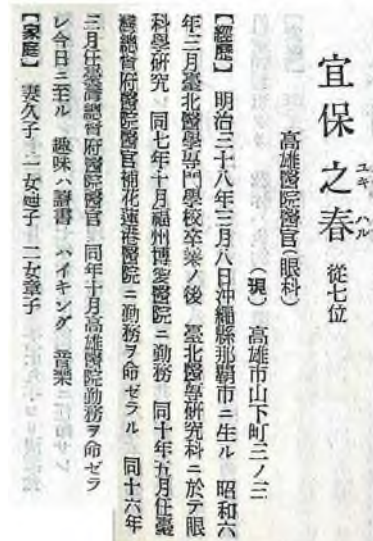


圖14、宜保之春於《臺灣人士鑑》中之個人資歷記錄

圖片來源：《臺灣人士鑑》

(四) 警務人員

日治時期的警察系統不僅負責傳統治安維護與刑事偵查，也深度介入地方行政與基層治理。警察業務涵蓋戶籍管理、保甲組織協調、公共衛生推廣及防疫工作，尤其在瘧疾、霍亂等傳染病防治中扮演關鍵角色。他們透過巡視、督導與資訊彙報，將中央政策落實至各村庄，形成治安與衛生並行的行政網絡，使警務職能同時兼具社會控制與公共衛生執行的功能。

1、宮城久安

在日治中後期高雄地區長期服務的沖繩籍警務人員當中，宮城久安（1899-?）可視為較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宮城久安出身於沖繩縣國頭郡國頭村，在臺灣的仕途自昭和 2 年展開，初任恆春郡役所警察課警部補，隨後歷任旗山郡、鳳山郡等地警部補。昭和 7 年升任屏東郡役所警察課警部，正式進入中高階警察官之列。此後，宮城歷任高雄州轄內多個重要職務，包括高雄警察署警部、東港郡役所警察課警部、旗山郡役所警察課警部，並曾出任高雄消防署長，最終更升任高雄州警察部刑事課長。昭和 19 年，他獲任臺灣總督府地方警視，敘高等官七等，同年亦獲從七位勳位。至昭和 20 年（1945），官報仍見其名，顯示其於二戰末期仍在臺灣任職。⁷⁰

由於警察職務與地方社會運作緊密相連，宮城在基層任職時即多次涉入社

⁷⁰ 「宮城久安外一名（內閣）」（1944-09-30），〈昭和 19 年 9 月臺灣總督府官報第 779 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2030779a006。「福澤平治外十六名（宮內省）」（1944-03-19），〈昭和 19 年 3 月臺灣總督府官報第 590 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2030590a007。

會事件與行政事務。昭和 5 年，他在鳳山郡處理汽車翻覆致死傷案件，並參與規模遍及全島、金額高達三萬餘圓的膳寫版詐欺調查，該案涉及百餘所公學校，反映出他已承擔跨州調查的任務。翌年，宮城續於鳳山辦理案件，包括臺東移送受賄犯人的偵訊與交通事故的相關處理，進一步展現其在地方社會秩序維持上的角色。

隨著職位提升，宮城的職務逐漸從單純的警察事務擴展至地方行政。昭和 10 年至 11 年（1935-1936），他於東港郡警部任內，參與保甲會議、地方協議會與道路建設評比，說明其警務工作已與地方治理緊密結合。昭和 13 年轉任高雄州警務部刑事課防犯係長，並參與屏東郡防犯協會的成立。其後升任刑事課長，昭和 16 年參與左營蓮池潭屍體案件的調查，顯示其在社會矚目事件中擔任核心角色。至昭和 19 年，宮城在戰局日益緊繃之際獲任地方警視，進入總督府高等官體制，仕途達到巔峰。

整體而言，宮城久安的仕途清楚展現了殖民地警察在司法、行政與社會治理之間的多重角色。他能自基層一路晉升至高等官，既體現沖繩籍警察在臺灣仕途的少見突破，也折射出戰時日本對地方治理與治安監控需求擴張的脈絡。如又吉盛清所指出，沖繩籍警察多集中於基層，升任警部者已屬罕見，宮城卻能在高雄州歷任要職，最終獲得地方警視與高等官身分，反映出在特定條件下，提供了沖繩籍人士有限但真實的升遷契機。換言之，宮城久安的職涯不僅是個人仕途的展現，更可視為觀察沖繩籍官員在日治時期高雄地區警界活動的一個具體案例。

戰後，宮城久安返回沖繩，先仍是擔任警務人員，後轉入地方行政體系，曾任琉球政府行政監察課長、官房次長、人事委員等職，延續其在公共事務領域的服務經驗，定居於那霸市古波藏。⁷¹

2、上原繁喜

在日本統治臺灣的過程中，瘧疾是最棘手的熱帶疾病之一。為了因應防治需求，經過政策討論，總督府逐步建立起透過警察體系推展的衛生行政方向。這套體系仰賴警務單位、保甲組織與地方衛生人員的合作，形成嚴格的疾病監測、藥物投藥與環境整頓網絡。在這樣的制度下，出身沖繩縣的上原繁喜（1893-?），便是其中一位在基層執行任務的衛生技手。⁷²

上原繁喜自大正 7 年（1918）起受雇於臺南廳大目降支廳，翌年轉任鳳山支廳。大正 10 年，進入鳳山郡役所警察課服務，翌年調入高雄州警務部衛生課。昭和 3 年正式任命為衛生技手，此後至昭和 17 年間，他長期服務於高雄州衛生課。⁷³

⁷¹ 大沢貞吉編著，《台灣關係人名簿》，頁 178。

⁷² 与儀清，《台湾の宝庫と沖繩県》（与儀清，1932），頁 124-125。

⁷³ 「勤績者（八月九日ノ績）」（1935-08-13），〈昭和 10 年 8 月臺灣總督府報第 2465 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32465a005。「勤績者」（1940-12-24），〈昭和 15 年 12 月臺灣總督府報第 4074 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他的職稱雖隸屬「警察課」或「警務部」，卻與一般意義上的警務工作不同。他的職責並非維護治安或逮捕嫌疑人，而是專注於公共衛生推動，尤其是瘧疾的防治。若要形象化地表達，可以說他的日常並不是「抓壞人」，而更接近於「抓病媒」和管理「病人」，同時將防疫動態依層級呈報，作為現地實況的依據，以形成最前線的實證資料。

衛生技手是基層衛生行政中的技術人員，通常具備醫學或衛生相關訓練。他們在地方承擔繁瑣而具體的工作，包括投藥、病例調查、病患追蹤、蚊媒防治與衛生教育等。根據總督府制定的《瘧疾防遏規則》，技手必須逐戶督導患者服用奎寧，記錄療效與病程；同時協助並動員地方推動清理積水、填平水窟、維護溝渠，以及設置紗門紗窗等各項防蚊措施。

上原繁喜正是在這樣的框架下展開工作，長期任職於高屏地區。他的職涯前期主要在高雄地區活動，至昭和 4 年，由岡山防遏所轉勤潮州郡枋寮；⁷⁴ 昭和 14 年，並參與了潮州郡衛生組合聯合會於竹田、內埔兩庄舉辦的共同防遏所落成典禮，這可能是由他直接負責的業務。⁷⁵ 從這些紀錄可見，他的職務不僅限於州廳衛生課的辦公室，也深入基層，直接參與防遏所的運作與推動。⁷⁶ 此外，他也參與了牡丹社事件墓碑改修事件，捐金一圓。⁷⁷

上原繁喜的工作軌跡，映照出日治時期瘧疾防治的實際樣貌。防瘧並非單純的醫療行為，而是基層警察、保甲組織與衛生技術人員共同推動的公共衛生實踐。來自沖繩的上原，透過這套機制進入臺灣的公共衛生體系，歷經廳、郡、州等不同層級，最終長期任職於高雄州衛生課。雖隸屬警務體系，他的任務並非維護治安，而是透過技術、監督與教育，落實各項防瘧政策。這既展現了防疫在改善地方健康上的成效，同時也反映出公共衛生在統治體制下被運用為規訓社會、塑造生活秩序的關鍵工具。⁷⁸

這樣的生命史並非孤例，而是眾多基層衛生人員的縮影。正因為他們持續投入，瘧疾流行才得以逐步控制，也使我們得以窺見公共衛生如何在日治臺灣成為制度化、常態化的治理技術。

3、伊川長壯

伊川長壯，其一生跨越了日治時期臺灣行政體制與戰後沖繩在美軍統治下的轉折，其職涯發展呈現出從臺灣基層雇員到琉球自治機構官僚的歷程，亦反映了不同政權更替下行政人員角色的連續性。

就有限的資料觀之，伊川長壯曾在中央自動車商會擔任駕駛，該商會位於

0071034074a013。

⁷⁴ 〈高雄岡山瘧疾防遏所上原繁喜氏〉，《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9 月 18 日，4 版，夕刊。

⁷⁵ 〈マ病防遏所の落成式〉，《臺灣日日新報》，1939 年 5 月 30 日，9 版。

⁷⁶ 〈マ病防遏審査 内埔庄は良成績〉，《臺灣日日新報》，1938 年 3 月 12 日，8 版。

⁷⁷ 《牡丹社遭難民墓碑改修報告書》，頁 15。

⁷⁸ 〈高雄之瘧疾死亡者〉，《臺灣日日新報》，1921 年 9 月 19 日，4 版。〈赤崁特訊 衛生施設〉，《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3 月 2 日，4 版。

高雄車站前，並有榮町支店。其後，伊川進入臺灣總督府的行政體系，自昭和 12 年起，年約 25 歲的伊川受聘於高雄州警務部衛生課，並連續三年擔任雇員，負責協助處理衛生行政及警務相關庶務，直接參與南臺灣公共衛生政策的推動與實務工作。昭和 16 年（1941），他轉任高雄州總務部總務課，繼續以雇員身份處理州廳層級的文書、會計及庶務工作，由此進一步熟悉中層級行政運作的流程。昭和 17 年，他被派往東港郡役所庶務課，職稱為「屬」，這一身份意味著他成為地方行政現場的實際執行者，承擔郡役所日常庶務的具體責任。昭和 19 年，他在岡山郡役所庶務課任「屬」，繼續服務於基層地方行政。同年 3 月，《臺灣總督府官報》第 589 期刊載「短期地方改良講習會修了者」名單，其中可見伊川長壯之名。該講習會由當局舉辦，旨在培訓地方吏員，使其掌握地方行政革新的理念與方法。伊川的名列顯示，雖身處基層職位，然已被當局視為具備潛力與專業素養的行政人員。其後，雖因時局與政治環境所限，未能在高雄州內進一步晉升，然其長期積累的實務經驗，已使其對地方行政運作具有相當程度的熟悉，並為其戰後持續延展的行政生涯奠定基礎。

伊川在臺灣的職涯應持續至日本統治結束為止，並返回沖繩。戰後，沖繩群島係由美國軍政府接管，這樣的新秩序，讓伊川長壯並未因國家體制劇變而退出公職，反而在變化的統治秩序下延續其行政生涯。就官方的資料觀之，他在 1951 年期間出任宮古群島議會書記長，掌理議會日常事務運作，成為新制度下地方政治運作的行政支柱之一。翌年，即 1952 年琉球政府正式成立，人事委員會隨之設置。伊川似於當年即進入該委員會事務局，歷任予算係長、總務課長以及給與課長等職務。他所負責的業務範疇，涵蓋預算編列、總務運作以及公務員薪俸制度的規劃與建置，顯示他已由日本時代的基層雇員，轉型為自治政府中具備制度規劃與實務執行力的行政官僚。在此階段，他的專業不僅獲得新政權的延用，更在制度初創之際發揮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值得注意的是，戰後其住所記錄於沖繩縣那霸市安里 347，顯示其個人生活重心轉移至沖繩本島。

綜觀其一生，伊川長壯的經歷展現出跨越兩個政權時期的公務人員縮影。他自殖民地的基層吏員起步，透過在州廳與郡役所的庶務歷練，以及短期地方改良講習會的培訓，逐步奠定其行政專業的基礎。戰後，他憑藉先前積累的經驗，順利轉入琉球政府體制，成為自治行政的重要參與者。他的生涯不僅映照出官僚制度在不同時代中的延續性，也揭示了戰後琉球地方治理對具備行政經驗人才的需求。這使得曾在臺灣受過訓練的吏員，得以返回沖繩，並在新的政治框架下再次發揮其專業能力，從而構成琉球自治制度建立初期不可或缺的人力資源之一。他的軌跡不僅是個人履歷，更映照出歷史洪流中，個體如何在政權更替的縫隙裡尋得位置的證明。

4、伊地柴清

伊地柴清（1879–1930），原名屋嘉比柴清，出身於沖繩縣首里市當藏町。

與其他在高雄地區活動的沖繩籍人士相較，他的特殊之處在於，直到警職退任之後，才定居於高雄州岡山郡楠梓庄。他在官職生涯中雖曾長期於南臺灣活動，但並未在高雄州內服務；改名為「伊地」亦是在退休之後的決定。此舉似乎使他能以全新的身分在楠梓展開後半生，重新構築其在地方社會的地位。

伊地柴清於明治 33 年入伍，編入步兵第十四聯隊，服役至明治 35 年退役。退伍後旋即來臺，自明治 38 年起擔任南投廳巡查，不久升任警部補。自此之後，他的職涯始終與臺灣中南部山區警務密切相關，特別涉及原住民族群與行政當局之間的緊張互動。

明治 42 年，霧社與萬大社因狩獵與耕作糾紛爆發流血衝突。當時身為警部補的伊地柴清率領隘勇與巡查前往現場介入，並在官方紀錄中留下了督導軍警行動的身影。明治 44 年（1911），他因「匪徒討伐」的功績而獲頒勳八等白色桐葉章，顯示其在維持治安上的軍警表現獲得當局的肯定。

此後他升任警部。大正 3 年至 4 年（1914–1915），排灣族四林格社因繳械問題與日方爆發嚴重對抗，迅速演變為南臺灣規模龐大的武裝衝突。當時仍以原名屋嘉比柴清行事的他，所領導部隊被冠以「屋嘉比部隊」之名，與其他警軍單位協同作戰，持續數月，並參與大正 3 年（1914）12 月初最為激烈的戰役。戰鬥過程中，雙方死傷慘重，地方社群亦遭受嚴重破壞。此一事件揭示基層警務人員在邊境地區兼具行政官僚與軍事指揮的雙重身分。戰後，他仍多次被調派至恆春、枋山、花蓮港等地，從事原住民族相關的鎮壓與管理任務。直至大正 10 年，他因病退職，翌年正式領受恩給證書，結束長達十餘年的警察生涯。⁷⁹

退官後的伊地柴清並未退出社會舞台，而是轉型投入地方事務與產業經營。他更換姓名，後定居於楠梓庄，並成為庄協議會員，積極參與地方自治事務；同時，他藉由專賣制度經營煙草販售，擔任煙草賣捌人組合理事。此後，他進一步涉足商界，出任自動車會社重役，並兼任青果同業組合役員。地方刊物甚至以「富有公共精神」形容其人，顯示他在地方社會兼具經濟與社會影響力的身分。⁸⁰ 從其改名，積極投入地方事業與活動，或顯示其有長居於高雄地區的規劃。而其最終於高雄辭世，其個人生命史於昭和 5 年 12 月 3 日劃下句點，享年五十一歲。他共有二男五女，生前累積相當資產與保險金，由長子伊地柴一（1905–?）繼承煙草販售業務，延續家族在地方經濟中的地位。⁸¹

總結而言，伊地柴清的一生展現了日治時期臺灣治理的複雜層面。在軍警任內，他作為基層官僚與前線指揮者，直接涉入原住民族抗爭事件的鎮壓與調

⁷⁹ 「恩給證書下付（屋嘉比柴清）」（1922-12-31），〈大正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十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3273012。

⁸⁰ 間島三二，《南臺灣の寶庫と人物 高雄州の卷》（高雄：圖南社，1931），頁 132。

⁸¹ 「第五十七區煙草賣捌人伊地柴清死亡二付業務承繼承認相續人伊地柴一」，〈自昭和三年度至六年度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公文類纂煙草永久保存煙草賣捌人指定關係（賣捌人賣捌區域等級決定）第三冊〉，《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102942010。

停，成為國家權力滲入邊境社會的重要執行者；而在退任之後，他則憑藉專賣制度、地方自治與產業組合，重新建構自身的「地方領導身分」。這些身分的取得，或許不僅來自於個人經營的努力，也反映了統治者對其過往服勤的肯定與嘉獎。

而他共使用了兩個姓氏在臺灣活動，背後似乎有特殊的因素。其生命史因此不僅是統治實踐的一個縮影，更揭示了退役警察如何在軍事與行政之外，透過轉型而持續滲透地方社會，進而影響經濟與公共事務。若從更廣闊的視野來觀察，伊地柴清的故事並不只是個人的傳記，而是殖民秩序如何在地方一層層展開的註腳。

然而，史料所留下的身影，往往僅僅是國家視角下的身分與功績。但在層層的檔案之下，仍隱約浮現一個具血肉的人，行走於帝國南境的烈日高雄中，見證了帝國與地方交錯的吉光片羽。



圖 15、伊地柴清

圖片來源：間島三二，《南臺灣の寶庫と人物 高雄州の卷》，頁 132。

四、投身教職的沖繩人士

就國家治權的視角而言，雖然臺灣與沖繩兩地的行政體制不同，但仍同屬於日本這個國家體制，在日常辦理行政程序與教育制度規劃時，也由於同屬一個國家體制，可依循官方制定的申報與處理程序。

（一）流動的人才調配

而同樣以日語作為「國語」，在學校或日常習得日語者，無論在公部門或私人間，溝通時可減少翻譯的成本與曲折，並得以擴展溝通的人群範圍。對於有心發展者，在受過教育，另通過受訓、國家考試或取得資格認定等後，便可依循體制，申請相關軍公教職務。尤其對於受日語教育成長的世代，選擇的就學與就業範圍除了沖繩地區，尚可延伸至臺灣。

在高雄的教育領域內，沖繩籍教師來源約略可分為兩大類，包括來自於沖繩縣受教完畢取得資格者，另一則為畢業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者。前者列舉者如久高友貞（1869-1911）、平識政龜（1893-?）、東恩納盛篤（1867-?）與漢那朝茂（1885-?）等，後者則有上原龜、東恩納盛亮（1878-1935）、山城正鳴（1880-?）、東恩納信與外間政善（1892-?）等。

比臺灣早 16 年被納入日本領土的沖繩縣，在 1880 年設置了「會話傳習所」，開始進行「普通語」的教學。這是因為當時日本與琉球之間的語言隔閡甚大，甚至需要通譯，為了培養有助於統治的即戰力人才而採取的措施。據說，政府從舊學校的學生中選拔出會話傳習生，並每日發給五錢的便當費，以培養所需人力。會話傳習所在同一年內併入師範學校，繼續推動日語教育。師範學校除了吸收會話傳習生外，還從縣內各地強制招收學生，逐步培育出一批師資，甚至可以至臺灣任教。

但要取得教員資格，因需至日本本島應試，以至於先是在資格取得上就甚受經濟條件的制約，故得以取得資格並來臺者雖有，反較本州中西部之多數府縣為少。⁸² 因而來臺接受師範教育、取得資格並在臺灣任教，成為不少有心於教育界的沖繩人士選擇。目前文獻中可見最早在高雄地方任職的沖繩籍教師，為明治 37 年擔任蕃薯藟廳蕃薯藟公學校教諭的上原龜，時年約 25 歲。而東恩納盛篤來臺後，則是先至臺東任教數年，於明治 39 年方轉往蕃薯藟公學校田藟分校。

至日治中晚期，隨教育政策下學校數量的增加，沖繩籍教師、代理教師進入高雄地區學校的人數更明顯增多，並轉向以在臺灣取得教師資格者為主。而有些沖繩籍校長、教師，並主要以南部為任教範圍，如外間政善、平識政龜、東恩納信等，生涯幾乎都在高雄、屏東地區任職。而隨沖繩籍教師人數逐漸增加，甚至有出現過東恩納盛亮與東恩納信兩者同時在旗山第二公學校（現旗山區溪洲國民小學）任教的組合。

在日治時期，沖繩籍教師在高雄教育界所佔的比例雖不高，但他們多數具備合格教師資格，並在教育現場表現優異，以下分就數個案例進行介紹。

（二）於沖繩取得教師資格者

部分沖繩出身之教育工作者，係於沖繩當地接受師範訓練並取得教師資格後，先在當地任教，累積一定教學經驗，繼而基於個人生涯規劃、對外地教職機會的積極追求，或對臺灣社會環境與教育現場的關注與興趣，自主選擇前往臺灣擔任教職。此類跨地域的教職流動，體現個體在教育專業發展過程中，所展現出的主動性與能動性。可列舉者，包括久高友貞、平識政龜、東恩納盛篤與漢那朝茂。

⁸² 謝明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頁 146-147。

1、東恩納盛篤

東恩納盛篤出生於日本慶應 3 年（1867）7 月 11 日，為沖繩縣首里區字真和志人，出身士族。他畢業於沖繩縣尋常師範學校，並自明治 22 年（1889）在沖繩地區展開教育生涯。

東恩納盛篤在沖繩地區的數所小學校擔任過專任與兼任教師，包括首里尋常小學校、國頭郡恩納尋常小學校、熱田簡易小學校、中頭郡津霸尋常小學校，並擔任考試委員、學務委員等職務。明治 30 年，升任恩納尋常小學校校長，之後更兼任津霸尋常小學校校長。任職期間，曾參與培訓並派至日本本島考察。然在明治 33 年，或因操勞過度而提出暫時退職。

然在同年 4 月，他從沖繩轉任至臺灣，參與了當時臺灣總督府推行的近代化教育，這樣的轉換原因不詳，或許是為了更換環境所致。他首先在臺東國語傳習所擔任雇員，月領 12 日圓。至 6 月便轉任教師，支領八級俸。7 月，轉任臺東國語傳習所太巴塢分教場服務，支領七級俸。值得注意的是，明治 38 年 3 月，東恩納盛篤獲准以「無試驗檢定」方式獲得公學校教員的免許狀（教師執照），並於同年 4 月晉升為臺東國語傳習所太巴塢分教場教諭兼校長。此舉反映出當時臺灣對教育人才的高度需求，總督府對具備資歷的日本籍教師，提供了特殊任用途徑。⁸³

之後，太巴塢分教場更名為臺東廳太巴塢公學校，東恩納盛篤持續擔任教諭兼校長。然而，在明治 39 年 5 月，他免除兼任校長職務，並轉任至蕃薯藿公學校田藿分校擔任教師兼主任，來到了高雄境內。他曾被收錄於《南部臺灣紳士錄》中，顯示其在當時社會中具有一定的地位與影響力。

東恩納盛篤的教育生涯並非一帆風順。由於臺灣的衛生條件與日本本土不同，他來到田藿分校後，於 10 月不幸罹患了瘧疾，導致身體衰弱。明治 40 年（1907）7 月，他因健康因素無法繼續從事教職，而不得不提出診斷報告書及辭呈，依願免官。儘管如此，總督府仍在他免官時給予了昇級的待遇，並於隔年發放了退休金證書，此舉亦可視為總督府對其過往貢獻的肯定與嘉獎。⁸⁴

總體而言，東恩納盛篤作為一位沖繩籍教師，在臺灣近代教育發展的初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的經歷也反映出當時臺灣在殖民地教育推動下，教師們所面對的挑戰與貢獻。在東恩納盛篤來臺服務的時期，正值臺灣總督府於新領地陸續推動「國語教育」的階段。「國語」在此指日語。總督府的教育目標是透過普及日語教育，以推動統治。如國語傳習所，這是日治初期設立的日語教

⁸³ 「東恩納盛篤公學校教員無試驗檢定出願二付免許狀授與ノ件」（1905-03-02），〈明治三十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四十八卷教育〉，《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094013。「教員免許狀授與」（1905-06-20），〈明治 38 年 6 月臺灣總督府報第 1771 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11771a015。「教員免許狀授與」（1905-06-20），〈明治 38 年 6 月臺灣總督府報第 1771 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11771a015。

⁸⁴ 「公學校教諭東恩納盛篤依願免官」（1907-07-12），〈明治四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第十一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340035。

育機構，主要目的是培養臺灣人學習日語的能力。東恩納盛篤所服務的臺東國語傳習所便是其中之一。而明治 31 年（1898）後，總督府開始在臺灣設立公學校，取代了部分國語傳習所，成為臺灣人子弟的主要初等教育機構。公學校的課程內容包含了日語、算術、體操、唱歌等，逐漸納入更為正規的國民教育科目。

東恩納盛篤在臺東廳太巴塢公學校及蕃薯藔公學校田藔分校的服務，正是公學校體系逐步建立與完善的體現。也可看出由於初期臺灣缺乏足夠的日語師資，總督府除了從日本本土招募教師外，並會透過像東恩納盛篤這樣的「無試驗檢定」方式，簡化程序以快速補充師資，特別是在東部地區或高雄的淺山邊緣地帶，日籍師資需求更為迫切。東恩納盛篤的服務經歷，即為這一歷史背景下的典型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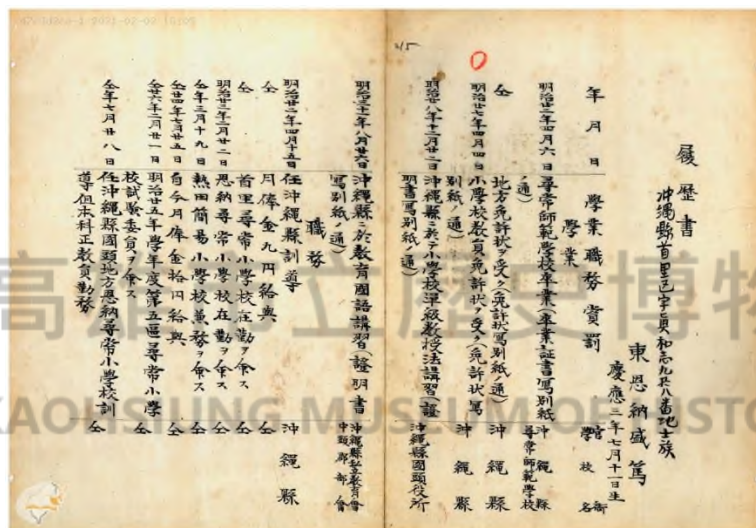


圖 16、東恩納盛篤的履歷書（部分）

圖片來源：「東恩納盛篤公學校教員無試驗檢定出願二付免許狀授與ノ件」。

2、久高友貞

久高友貞（1869 年 11 月 6 日－1911 年 9 月 15 日），沖繩縣首里人，是日治時期活動於臺灣初等教育界的沖繩籍教師之一。他自明治 38 年來臺任職，後輾轉於多所公學校任教，且主要以高雄地區為活動範圍，對臺灣地方教育推展有實質貢獻。雖然他因意外而早逝，但仍留下值得銘記的教育史蹟。

久高友貞出生於沖繩縣首里，明治 23 年（1890）畢業於沖繩縣尋常師範學校。該校創立於明治 13 年（1880），是沖繩近代教育體制下的核心師範教育機構，旨在培養小學教員。該校的設立與日本政府「同化政策」密切相關，目標是推廣日語教育、普及近代學科，進而改造琉球在王國時代所延續的傳統學習方式。

明治初期，沖繩方才歷經「琉球處分」，王國被廢止並改設沖繩縣。隨之

而來的，是日本政府積極透過教育制度的建設，推動地方社會的統合與近代化。在此脈絡下，沖繩縣尋常師範學校的設立自有其政治與社會教化的意義。首先，它是師資培育的核心。當時沖繩普遍缺乏受過日式教育訓練的教師，而師範學校成為培養小學師資的唯一管道。畢業生多被派往各地小學，成為推展義務教育的中堅力量。其次，它是日語教育的推進者。在社會日常語言仍以琉球語（沖繩語）為主的情況下，日本政府規定小學課程必須以日語授課。師範學校學生在校內接受日語訓練，因而成為地方上最早熟練使用日語的一批人，進一步推動語言同化政策的落實。再次，師範教育亦代表近代化與社會流動的新契機。受過師範教育的畢業生，通常能進入官廳或教育界服務，成為新時代社會的重要專業人才。對當時的沖繩青年而言，師範學校不僅是一條教育養成的道路，更是進入近代社會的通道。

因此，久高友貞能於明治 23 年自沖繩縣尋常師範學校畢業，顯示他屬於明治初期第一批接受正規近代師範教育的沖繩人之一，其背景也突顯了當時教育制度在社會轉型中的重要角色。

久高友貞畢業後即從事教職，於明治 23 年服務於首里尋常高等小學校。該校的沿革可追溯至明治 13 年，當時沖繩的教育制度方才依循日本本土的學制逐步推行，原有的村學校因而被廢止，並在當藏村設立東小學校、於寒川設立西小學校，以及於儀保設立北小學校，形成三所分立的基礎教育機構。隨著就學需求的增加與教育行政的整合，明治 19 年 7 月，新建校舍落成，東、西、北三校合併為一所統一學校，並更名為「首里小學校」，象徵地方小學教育體系進入新的階段。同年 12 月，學校正式設立女子部，首次接納女子入學，顯示出近代教育普及理念的推展。其後，隨著《小學校令》的修訂與教育制度的發展，明治 21 年（1888）2 月，校名更改為「首里尋常高等小學校」或「首里高等小學校」，反映學校已設置尋常科與高等科，涵蓋更廣的教育年限。至明治 26 年（1893）9 月 20 日，校名再度確定為「首里尋常高等小學校」，與全國學制名稱趨於一致。

他後來一度離開教職，於明治 36 年受聘於臨時沖繩縣土地整理事務局擔任助手。該局設立於明治 31 年 7 月，隸屬大藏省，乃因應沖繩在廢藩置縣後土地制度轉換的需要而設。其設立目的，在於廢除琉球王國時代遺留的舊有土地制度，導入近代地籍調查與地租體制，主要業務包括土地測量、地籍整備、土地所有權確認、地價評估與台帳編纂等。組織架構上，由沖繩縣知事兼任長官，那霸稅務管理局長兼任次長，下轄事務官、書記、技手等事務人員與技術人員，以專責執行沖繩群島各地的土地整理。隨著既定目標的完成，該臨時機構於明治 36 年 12 月正式裁撤，相關權限逐步移交予常設行政機關。

久高友貞在沖繩累積了豐富的行政與教學經驗之後，隨著臺灣總督府積極推動教育，他於明治 38 年渡臺，展開了在臺教育現場的新階段生涯。

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在建立教育制度的過程中，面臨師資嚴重不足的挑戰。當時本島的師資培育體系尚未健全，因而大量延攬日本內地師範學校出身

的人員前來任教。對沖繩而言，當地已有相當數量的本土及內地人士投入教育工作，競爭相對激烈；因此，地理位置鄰近且交通便利的臺灣，便成為沖繩師範畢業生的重要出路之一。對總督府而言，沖繩亦是穩定且持續的師資來源地。

沖繩籍教師的派遣同時帶有特殊的政策意涵。由於當時臺灣部分地區治安未靖，例如宜蘭地區仍有武裝勢力活動，而山地與南部聚落則常被視為邊陲地帶，總督府往往將沖繩籍教師分派至這些偏遠或風險較高的地區。此舉不僅解決了師資不足的問題，也反映出殖民政府在「內地延伸」與「邊疆治理」上的策略運用。於是，這些教師不僅是知識傳授者，同時被賦予社會教化與地方安定的使命。然而，由於環境艱困，他們的任教歷程往往伴隨高度風險，甚至付出健康或生命的代價。久高友貞正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的經歷與殉職不僅彰顯了個人的專業奉獻，也折射出殖民教育推展背後的社會條件與結構。

抵臺後，久高友貞初任宜蘭小學校雇員。翌年，即明治 39 年，他正式獲授公學校教諭免許狀，正式展開臺灣的教員生涯。⁸⁵ 其後，他歷任多項職務，先是明治 39 年在深坑廳新店公學校任雇員；自明治 40 年起，他轉赴高雄地區服務，擔任鳳山廳楠梓坑公學校教諭，並兼任校長職務。至明治 42 年，他解除校長兼任職務，繼續擔任教諭；同年起至明治 44 年，轉任鳳山公學校港仔墘分校教諭，持續投入地方教育工作。⁸⁶

在任期間，久高友貞因其勤勉表現多次獲得總督府嘉獎與加俸。明治 41 年他曾獲昇級調薪，可見其在教育行政與教學現場均深受肯定。他的生涯，體現了沖繩籍教師在臺灣教育建設中的角色與意義，同時也折射出殖民教育推展的社會實況與制度脈絡。

久高友貞屬於日治初期派駐臺灣的沖繩籍教師群體之一。這些師範學校出身的沖繩教師，被派往臺灣邊陲或治安不靖的區域，承擔推動初等教育、穩定地方的重任。久高自宜蘭、楠梓坑至鳳山港仔墘，皆屬社會環境複雜之地，他能持續服務並獲賞與，顯示其在地方教育推展上確有貢獻。

雖對臺灣及高雄地區的教育貢獻良多，但臺灣也成為久高友貞的葬身之地。明治 44 年夏季，久高友貞奉准返鄉省親，不料於基隆港搭乘大阪商船株式會社「大運丸」客船時，突遭事故，起貨機械意外墜落，重擊船上乘客，久高與其女雙雙受傷。《臺灣日日新報》隨即刊載相關消息，指出久高頭部重創，傷勢危殆，經送入基隆醫院晝夜搶救，情況一度好轉。但最終仍於同年 9 月 15 日因傷重不治，享年僅 41 歲。⁸⁷

其殉職後，臺南廳長松木茂俊特地上呈，建議以一時金予以獎與，以彰顯

⁸⁵ 「佐藤信久外一名教員免許狀授與ノ件」(1906-02-28)，〈明治三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四十卷教育〉，《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196018。

⁸⁶ 臺灣教育會編，《芝山巖誌》(臺北：臺灣教育會，1933)，頁 141、304。

⁸⁷ 〈不測之禍〉，《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1 年 7 月 25 日，3 版。「台灣公學校教諭久高友貞賞與ノ件」(1911-09-30)，〈明治四十四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判)第九卷甲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890079。

其「事務格別勉勵」之精神。翌年，其遺屬久高カマト（妻）依規請領寡婦扶助料，顯示官方對於其犧牲的補償與肯定。

久高友貞雖在臺服務未及七年，然其短暫卻密集的職涯，呈現了日治初期教育體制下沖繩籍教師的典型軌跡。他與同儕多被派往治安未靖或邊陲地區，成為最前線的教育實踐者。但久高在任內屢獲官方嘉獎與加俸，反映其勤勉與專業，獲得體制的肯定。

故在臺灣教育史的脈絡之中，久高友貞不僅是「沖繩師範群體」的具體案例，更是一個能夠折射教育推展的代表個案。不僅提供了觀察臺灣教育政策運作的切入點，也有助於理解人力調度與地方社會互動之間的張力與連動。

3、漢那朝茂

漢那朝茂出生於明治 18 年（1885），為沖繩首里市人，是漢那朝忠（明治 7 年／1854 年生）之次子。明治 28 年，年僅十歲的朝茂被過繼為漢那朝諄之養子。明治 38 年，自沖繩縣立中學校畢業，並於明治 44 年取得小學教員資格，之後在沖繩各校從事教育工作，累積有 13 年教學實績，期間參加多項教育講習，具備相當豐富的教育經驗。⁸⁸

大正 13 年 5 月 28 日，因準備來臺從事教職，故漢那朝茂向臺灣總督府申請「公學校甲種本科正教員」資格。申請書內容包括戶籍謄本、履歷書、良民證、身體檢查證明、中學畢業證明、小學教員證明及教員檢定申請書等文件，經由掛號信寄出後，於 6 月 8 日抵達臺北。總督府於 6 月 17 日致函沖繩縣知事查核其資格，由於其經歷無誤，7 月 4 日即通過教員檢定委員會審查，並於 7 月 11 日正式授與公學校教員證書。⁸⁹

自此，漢那朝茂展開其在臺灣的教育生涯，其主要教學地點在高雄州（今高雄市與屏東縣）境內，並皆服務於公學校而非小學校。先是初任於屏東廳的新園公學校（今屏東縣新園國民小學，月薪 65 圓，後轉任萬丹公學校（今屏東縣萬丹國民小學，月薪 67 圓至 73 圓）。至昭和 5 年，升任高雄州大林蒲公學校（今高雄市立鳳林國民小學）訓導兼校長，後又陸續至岡山郡的田寮公學校（現已裁併）與右沖公學校（今高雄市右昌國民小學）擔任校長，至昭和 15 年轉任舊寮公學校（今高雄市立舊城國民小學）後方結束教職生涯。顯示其在教育領域的深厚歷練與專業能力。因其在臺任教期間，已屬日治中期，學校數量增加，來臺任教的沖繩籍教師亦隨之增加，故漢那朝茂遂有契機與其他沖繩籍教師同校。如在右沖公學校期間，甚至與新城安可、國頭力メ兩位沖繩籍教師一同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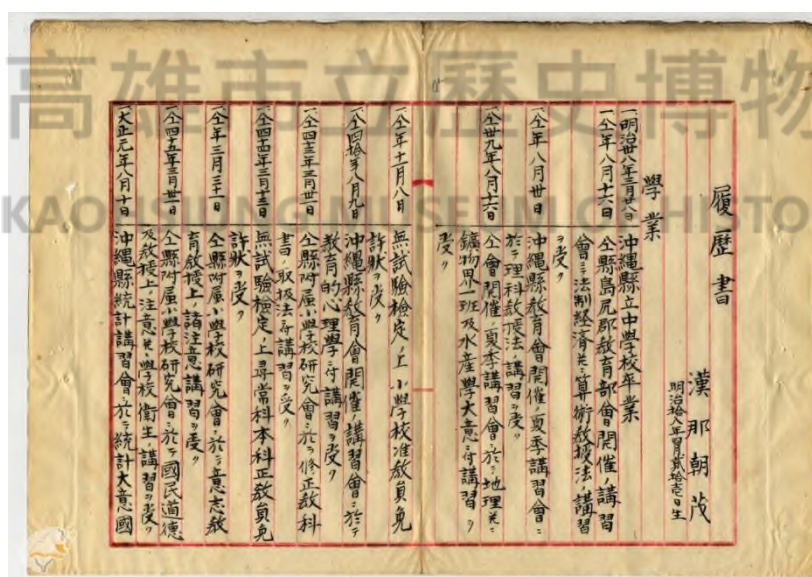
⁸⁸ 「漢那朝茂外一名教員檢定出願者二免狀授與ノ件」（1924-07-01），〈大正十三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五十一卷教育〉，《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7263001。

⁸⁹ 「漢那朝茂外一名教員檢定出願者二免狀授與ノ件」（1924-07-01），〈大正十三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五十一卷教育〉，《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7263001。

漢那朝茂婚後與妻子靜育有七名子女，其中包括出生於大正 14 年 2 月 8 日的三女品川⁹⁰富子（1925–2024）。富子女士在其晚年口述回憶中，提及父親於其出生後僅兩週後，即為履新而赴臺。當時全家仍留居首里，母親以父親匯款及簡單內職維持一家生計，直至孩子們完成學業。⁹¹

昭和 17 年 3 月，富子自縣立女子工藝學校（位於首里）畢業後，與母親及姊姊信子一同赴臺灣與父親會合，展開新的生活。此時，朝茂已自學校校長職退休，轉任高雄市役所任職。當時家中已有多名成員定居臺灣，包括長女貞子、次男朝康與其妻梅子、以及四男朝詮。富子與姊姊初至臺灣時寄宿於兄長工作的仁武小學教員宿舍，之後也陸續於高雄尋職。戰爭期間，朝茂一家經歷日本軍南進政策與戰事壓力。隨著空襲加劇，家族一度疏散至臺中州竹山（今南投縣竹山鎮），並還罹患瘧疾。戰後，歷經波折，全家終一同返回沖繩。

漢那朝茂的一生，跨越明治、大正與昭和三代，身為沖繩人卻長期在臺灣教育界服務，以高屏地區為主要活動區域，並主要在漢人就讀的公學校服務。不僅體現當時政策下的人員流動，也留下沖繩與臺灣間深厚的歷史連結。他的家庭故事，亦映照出許多沖繩家庭在戰前戰後的時代變遷與遷徙歷程。



日付	職務
明治三十八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三十九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四十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四十一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四十二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四十三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四十四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四十五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四十六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四十七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四十八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四十九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五十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五十一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五十二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五十三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五十四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五十五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五十六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五十七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五十八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五十九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六十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六十一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六十二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六十三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六十四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六十五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六十六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六十七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六十八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六十九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七十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七十二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七十四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七十六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七十八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八十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八十二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八十四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八十六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八十八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九十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九十二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九十四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九十六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九十八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明治九十九年八月廿一日	沖繩縣立中學校教員

圖 17、漢那朝茂之履歷表（部分）

圖片來源：「漢那朝茂外一名教員檢定出願者二免狀授與ノ件」。

4、平識政龜

平識政龜出生於明治 26 年 2 月 17 日，故鄉位於沖繩。他並非在臺灣取得

⁹⁰ 係為夫姓。

⁹¹ 〈父が働く台湾に転居 軍に就職も自然消滅 品川富子さん（90）〈未来に伝える沖繩戦>85（上）〉，《琉球新報》，2024 年 12 月 31 日。網址：<https://ryukyushimpo.jp/news/entry-3670634.html> [讀取日期：2025 年 5 月 18 日]

教師資格，而是在大正 4 年自沖繩縣師範學校畢業。平識於畢業後數年，來到臺灣投身小學教育，成為殖民地社會中的「外來師資」。這些外來教師在日治臺灣承擔的不僅是基礎教育的教學工作，也肩負了政府教育政策的實施與推廣責任，從語言、紀律到課程安排皆深受日本本土教育理念影響。

大正 10 年起，平識任職於高雄州高雄第一尋常高等小學校，最初為教諭，次年即升為訓導。在 1920 年代至 1930 年代，他長期服務於高雄第一尋常高等小學校，歷年俸給與職責逐漸提升，可見其專業受到肯定。昭和 13 年以後，他轉至鳳山尋常高等小學校，之後又調任屏東的海豐國民學校，並在昭和 16 年正式出任校長職務，獲授「從七位勳八等」。⁹²最後於昭和 20 年 3 月 5 日，平識被任命為車城國民學校第十三任校長，意即在戰爭末期，他仍肩負學校運作與學生訓育之責。

若將平識的經歷置於日本時代中後期教育背景來理解，可看出其角色的特殊性。至日治中期，臺灣教育也逐漸加入軍事色彩，並更強調國家意識，這也正是少年團制度活躍的年代。大正 15 年，高雄少年團正式成立，身在教育第一線的他，在相關活動中應擔任有指導的任務。如昭和 5 年一份《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記錄，高雄少年團第一分團 39 名學生即由「平識一小訓導」率領前往鳳山飛行場進行活動，這樣的行程帶有濃厚的訓練色彩。

少年團原先是以課外活動形式存在，但在 1930 年代逐漸制度化，並與地方行政、社會教化工作結合。例如「社蕃員」制度中，教師亦擔任輔導與指揮的角色。平識政龜的名字就出現在昭和 11 年《少年團研究》雜誌的記錄之中，顯示他同時兼具地方少年團幹部的身份，既是校園的教育者，也在社會層面參與統治機構安排的青少年訓育工作。

平識政龜在高屏地區的教育生涯，不僅塑造了他個人的教育職涯，也反映了當時沖繩師範畢業生在臺灣教育體系中的角色，即日治時期臺灣學校教育從基礎教化到國家動員體制下的歷史過程，體現了當時教員在教室內外的多重角色——既是知識傳授者，也是國家理念的執行者。

⁹² 臺灣興南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頁 337。



圖 18、平識政龜之經歷

圖片來源：臺灣興南社編，《臺灣人士鑑》，頁 337。

（三）於臺灣取得教師資格者

由於日治時期臺灣之教育體制較沖繩地區更為完善與多元，具備相對優越之學習資源與職涯發展機會，故吸引部分沖繩出身者前往臺灣接受師範教育，並於取得相應教師資格後，留在臺灣從事教職工作。此一現象展現部分沖繩人士在國家體制下對向上流動之可能性的積極回應。

1、東恩納盛亮

東恩納盛亮，沖繩首里出身士族，是一位在日治時期橫跨沖繩與臺灣的教職人員。他畢業於沖繩縣尋常中學校後，同年來臺進入及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明治 33 年畢業後，即在臺灣任教。

其在臺教育生涯長達二十餘年，足跡遍佈臺灣各地，尤以澎湖、高雄、屏東一帶最為顯著。自明治 36 年起，東恩納陸續於新竹廳頭份、北埔公學校擔任教諭，其後轉任澎湖廳港仔、白沙島等地之公學校，並擔任校長職務。⁹³明治 44 年起轉往嘉義、水堀頭公學校，再至 1920 年代活躍於屏東阿緱廳頓物（今屏東竹田）、高雄旗山、美濃、吉洋等地。昭和元年擔任澎湖馬公第一公學校校長兼訓導。其行政職與教學職並重，顯示其深受官方信賴及教育能力肯定。

根據地方傳說與文獻資料，東恩納盛亮並非典型的「硬性日本化」教育代表。他似乎偏向在地融合，展現人性與文化同理心。例如在竹田頓物公學校任

⁹³ 「東恩納盛亮外一名公學校教員無試驗檢定出願ニ付免許狀授與ノ件」（1905-02-15），〈明治三十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五十卷教育〉，《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096001。

校長期間（1916–1920），他以平易近人的風格，打破日籍教師的距離感，據說能講流利客語，並針對當地不熟日語的學生減少語言壓力，反而強化算術與自然科教育，以實用知識提升農村家庭子弟的學習動機。他主張培養學生自我，鼓勵體育與劇團活動，甚至親自下田種菜補充營養午餐，被視為臺灣營養午餐制的早期實踐者之一。

作為琉球士族後裔，東恩納在日本帝國將琉球併吞後進入日本教育體制，又於青年時期遠赴殖民地臺灣任教，其身分與經歷本身即為多重邊界的交會。他非本州出身，卻代表帝國教育體系，亦因此被迫面對日本內部族群階層與臺灣社會的異質性。他的教學生涯展現了超越身份歧視的努力，贏得南部農村社會的尊重與懷念。1920 年代末期，他先後在高雄州旗山、美濃等地擔任訓導與校長，活躍於高雄的教育界。昭和元年，轉擔任澎湖馬公第一公學校，該校的前身可上溯至明治 29 年成立的澎湖島國語傳習所，具有悠久歷史，東恩納盛亮則成為該校的第 11 任校長，並兼任澎湖廳馬公街立水產補習學校，是該校第 3 任校長。然而，他於隔年即在菊島告別了教育崗位。後於昭和 10 年逝世。

綜觀東恩納盛亮的教職生涯，他不僅是日治時期的教育人員，也是一位具文化調解能力的實踐者。他在臺灣計達 27 年之久，任教處遍及南北，留下了諸多地方教育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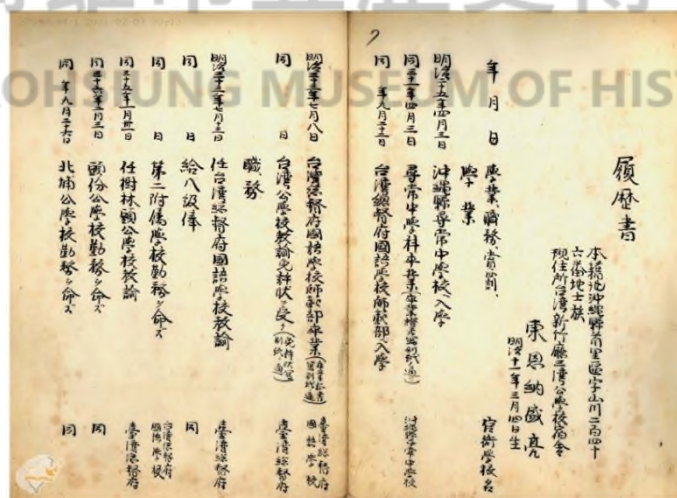


圖 19、東恩納盛亮之履歷書（部分）

圖片來源：「東恩納盛亮外一名公學校教員無試驗檢定出願二付免許狀授與ノ件」。

2、上原龜

上原龜為目前文獻所見最早在高雄地區任職的沖繩籍教師。雖然其投入教育工作的時間略晚於同鄉的東恩納盛亮，但由於東恩納最初服務於新竹、澎湖等地，直至較晚才轉赴高雄，因此在高雄地區教育史上，仍以前者上原龜作為

首位有據可查的沖繩籍教師。

上原龜生於明治 12 年 3 月，籍貫為沖繩縣島尻郡小錄間切具志村十四番地，身份為平民。青年時期赴臺求學，為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五屆畢業生。在日治初期的教育體制下，國語學校是專責培養日語師資的重要機構，其畢業生多被派往臺灣各地擔任小學校或公學校教員。上原龜即屬此批受訓師資之一，於 25 歲時投身教育界。⁹⁴

明治 37 年，他受聘為蕃薯藟廳蕃薯藟公學校（今高雄市旗山國小）教諭。該校創設於明治 31 年，為日治初期高雄地區最早設立的學校之一。上原龜的到任，不僅體現官方對地方教育師資需求的回應，也顯示沖繩籍師資在臺灣基層教育網絡中的實際參與。⁹⁵

雖然其後續生平與教育事蹟的史料尚付闕如，但上原龜作為日治初期少數來臺任教的沖繩籍教師，其經歷不僅反映了當時沖繩與臺灣之間的教育人事流動與交流，亦見證了高雄地區近代教育的萌芽與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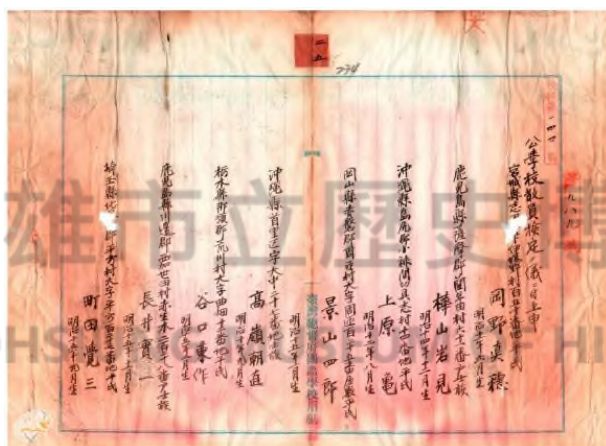


圖 20、上原龜通過公學校教員檢定之紀錄

圖片來源：「國語學校師範部甲科卒業生岡野真穂外十八名同乙科卒業生郁文外三十四名ニ公學校教員免許狀下付ノ件」。

3、山城正鳴

山城正鳴生於明治 13 年 11 月，籍貫沖繩縣那霸市，出身士族家庭。年少時受良好教育，明治 34 年自沖繩縣立第一中學校畢業，為該校第 13 屆畢業生。

隨後，他渡海來臺，於明治 36 年進入當時唯一的師資培育機關—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甲科修業，屬一般生。該校為日治前期教育體系下之核心師資養成機構，旨在培養能通曉日本語並能推動殖民教育的教員。山城正鳴在

⁹⁴ 「國語學校師範部甲科卒業生岡野真穂外十八名同乙科卒業生郁文外三十四名ニ公學校教員免許狀下付ノ件」（1903-07-06），〈明治三十六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七十四卷教育學術〉，《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874025。

⁹⁵ 末武美佐，〈日治前期臺灣公學校的沖繩籍教師(1895～1918)〉，頁 72。

沖繩時並無教學經驗，但透過來臺受訓，獲得了完整的師資專業訓練，奠定其進入教育現場的基礎，隨後便展開長達數十年的教育事業。⁹⁶

明治 39 年，他於嘉義廳打貓公學校任教，旋即轉赴樸仔腳公學校、太保公學校，並兼任校長職務。⁹⁷ 當時嘉義地區正值鼠疫流行，此為日治初期重要的法定傳染病。在此嚴峻情況下，他仍能維持校務與推動基層教育，展現了教員的社會責任。明治 43 年至大正 4 年，他長期服務於鹿仔草公學校，積極參與校務經營與地方教育推廣，深受地方社會認同。

大正 6 年（1917），山城正鳴轉至臺南廳大社公學校任教，期間因其教育貢獻曾受臺灣總督嘉以銀杯一個。⁹⁸ 自大正 11 年（1922）起，他又至高雄州路竹公學校任教三年，並於大正 14 年轉任屏東佳冬公學校。佳冬公學校為當地重要的教育機構，他在任內致力於提升學童就學率與師資培育。大正 15 年，以佳冬公學校長之身份，獲頒從七位勳八等，並受臺灣教育會表彰，顯示其已由基層教員躍升為地方教育領導人物，獲得官方與教育界的肯定。⁹⁹

除教育專業外，山城正鳴亦積極參與地方公益與沖繩人群體的跨地域事務。大正期以降，高雄逐漸發展為南臺灣的重要港市與工業重鎮，沖繩移民社群也隨之壯大。1920 年代，琉球士人伊波普猷、照屋宏等人推動恆春「琉球藩民墓」修墓運動時，山城正鳴與在高雄的沖繩人士共同捐資響應，體現其在教育之外，亦積極參與族群記憶維護與跨海交流。然而，其後有關他的紀錄逐漸減少，似在昭和 2 年後離開教職。

總結而言，山城正鳴的教育事業以南部為中心，歷經嘉義、臺南，至大正期逐漸定錨於高雄州，並最終在佳冬公學校長任內達到專業與社會影響力的高峰。其活動範圍，與沖繩籍教師主要集中在臺灣南部活動的趨勢相符。透過山城正鳴的經歷，可更深入理解沖繩出身知識人如何在高雄地區的地方教育與社會建構的角色與貢獻。

4、外間政善

在臺灣接受教育並取得教師資格者中，屬於日治中期後期、可舉例者如外間政善。外間政善出生於明治 25 年 11 月 28 日，其出生時點距離日本正式領有臺灣已相當接近。他的本籍為沖繩縣那霸市高橋町，出身於士族階級，是日治時期活躍於臺灣南部的沖繩籍教育工作者之一。

⁹⁶ 「國語學校師範部甲科卒業生本多季三郎外二十名公學校教員免許狀授與ノ件」（1905-04-28），〈明治三十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四十八卷教育〉，《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094016。

⁹⁷ 「公學校教諭山城正鳴兼任公學校長」（1908-05-01），〈明治四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判)第五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437012X002。

⁹⁸ 「公學校教諭兼校長山城正鳴（轉勤）」（1916-04-01），〈大正五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判)第四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583041。

⁹⁹ 〈臺灣教育功勞者として表彰せられたる十一氏略歴〉，《臺灣教育》293（1926.10），頁 57-58。

外間政善曾就讀沖繩縣中學校，而根據該校的學籍資料顯示，他最初畢業的是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附屬學校，其入學學區標示為「臺北」，顯示其早年即在臺灣受教育。因進入沖繩縣中學校時他年僅 15 歲，故這樣臺灣與沖繩之間的往來可能與家庭的遷徙或家族對其就學安排有關。¹⁰⁰

結束中學校的學業後，先返回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擔任雇員，後正式就讀師範部，於大正 3 年獲得教師資格，並隨即到阿緱廳萬丹公學校任教，月俸 25 日圓。而綜觀外間政善的教職生涯，也是主要集中在高雄州地區，包括教於萬丹、新園、林邊、九塊、竹園、里港等多所公學校，並在大正 10 年 4 月起擔任新園公學校校長職務。昭和 3 年受大禮紀念章，後續他亦曾擔任美濃國民學校校長，在臺灣的教育生涯最後，於美濃任職。¹⁰¹ 他被評為「資性溫厚，少言而篤行，身體力行」，並被報導指出是石橋式的健實主義者（比喻謹慎踏實），強調辦理事務，須從縱橫各方面徹底審察情勢後再著手，而被視為是一位具有理想經營觀的教育家，溫厚篤實，深受信賴，長年盡瘁於高雄州的教育界。¹⁰²

在學校教育之外，亦致力於社區教育。昭和 17 年，臺灣山岳會高雄支會前往月光山登山途中，就曾接受外間政善的款待。其報告指出：

悶熱的九月十九日午後一點四十分，從高雄火車站出發，在九曲堂轉乘臺糖線，經旗山，四點到達美濃庄。拜訪國民學校並休息，在和田老師的引導下，從村落前往二公里左右，位於北方山麓的廣善堂。

廣善堂前為萬頃的稻田，後接翠巒連峰，伴著晴嵐，閑寂氣氛追隨而來。此處，供奉著玉清帝和關帝君，為庄民信仰的廳堂，在近代的建築上，仿效著過去廟宇的樣式，以強烈的色彩和誇張的雕刻華麗的裝飾著。兩棟的本堂不用說，事務所、客房、浴室、廁所等皆無可挑剔，有著自來水、電燈等豪華的設備。

一行人受招待進入位於後殿階上安置神位兩側的日本房，在有間隔的浴室沐浴，洗落俗塵，於院內散步。在夕陽輝耀的鐘樓鼓閣迴蕩的聲音，誦經聲起、香煙發出薰香，我也專心致志進入修行。全體在食堂，接受外間校長的歡待，同時以各自帶來的珍肴美味為晚餐。¹⁰³

¹⁰⁰ 不著撰人，《沖繩県立中学校生徒成績表》（1908），頁 19。

¹⁰¹ 新高新報社編，《臺灣紳士名鑑》，頁 39。

¹⁰² 島村一郎，《昭和維新更生史》（東京：日本合同通信社，1939），頁 387-388。〈高雄州美濃國民學校長 正七位勳六等 外間政善君〉，《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 10 月 30 日，4 版。

¹⁰³ 高雄支部報告，〈月光山初登山〉，《臺灣山岳彙報》14：11（1942 年 11 月），頁 6-7。



圖 21、外間政善臺灣視察相簿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5、東恩納信

東恩納信出身於沖繩縣士族¹⁰⁴，長期投身於臺灣南部與澎湖的教育事業，其教職生涯橫跨十餘年，足跡遍及高雄及澎湖多校，展現出沖繩籍教師在基層教育現場的典型軌跡。

其投身教育活動可追溯至大正 10 年，時任旗山第一公學校溪洲分教場代理教員（該校後改制為高雄州旗山第二公學校，即今高雄市旗山區溪洲國小），至大正 12 年仍留任。該分教場設立，係因應人口增加與教育需求提升而來。東恩納信的任職，正處於地方教育逐步擴張的階段，對該校的穩定運作具有一定助益。其間，他亦與同為沖繩出身的東恩納盛亮同校服務。

大正 13 年（1924），他取得正式教員資格後，轉至高雄州吉洋公學校（今高雄市美濃區吉洋國小）任訓導，翌年續任。大正 15 年，他外派至澎湖廳馬公第一公學校擔任訓導，並在昭和 2 年續任。馬公第一公學校為澎湖最早設立的公學校之一，承擔群島教育核心的角色。昭和 4 年起，東恩納信回到高雄州，服務於旗山的手巾寮尋常小學校，擔任代理教員，並持續任教至昭和 8 年（1933）。他並於昭和 5 年取得尋常小學校本科正教員資格。¹⁰⁵ 昭和 9 年，他再度回到高雄州吉洋公學校，任代理教員，後即無相關任教紀錄。

總結而言，東恩納信雖多以代理身分服務，但其教職遍及城鎮、農村與離島，體現了基層教師在不同社會環境中的適應與貢獻。他的履歷亦折射出沖繩籍教師群體在當時教育網絡中的配置，其足跡集中於南部與離島，反映出當局對沖繩籍教師的定位與運用。即便雖多以代理職務任教，卻在教育建構與地方社會連結中，仍發揮了一定的承先啟後作用。

¹⁰⁴ 「教員免許狀授與」（1931-04-19），〈昭和 6 年 4 月臺灣總督府報第 1224 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31224a005。

¹⁰⁵ 「教員免許狀授與」（1931-04-19）。

五、代表性的民間沖繩人士

在官方都市規劃與港口建設的推動下，高雄逐漸由地方性聚落轉型為新興港市，並進一步發展為南臺灣的重要經濟與交通樞紐。隨著港灣設施的持續擴充，商業活動呈現集聚效應，吸引來自日本各地的業者投入經營，促使運輸、貿易、製造與零售等部門快速成長。且隨著人口大量移入，都市空間不斷擴張，高雄也逐漸成為民間業者尋求發展的重要場域，並為若干沖繩籍人士提供了商業實踐的舞台。然相對於公教人士，民間人士的資料相對零散，故以下僅列舉二例，以做呈顯案例。

（一）桃原良毅

桃原良毅（1884—？），沖繩縣首里區士族出身。明治 36 年自沖繩縣立第一中學校（第十五屆）畢業。約在 1910 年代投身琉球資本主導的南方經濟活動，曾任八重山炭礦株式會社高雄出張所主任，並兼營丸一洋行（丸一商社）之貿易業務。¹⁰⁶ 其居所與事務所設於臺灣高雄湊町，透過臺灣銀行、商工銀行等金融機構辦理資金往來與結算。¹⁰⁷

八重山群島自明治後期以來發展煤礦業，其產煤甚需仰賴外部市場消化。隨著日治時期高雄港建設的推進、臺灣南部蔗糖產業規模的擴大，以及縱貫鐵道通車後的燃料需求等，八重山煤炭逐漸成為南部地區的重要燃料來源。¹⁰⁸ 此一背景吸引沖繩資本進入高雄設立商社與出張所，八重山炭礦株式會社即為其中之一。該社高雄出張所由高嶺朝申（1863—？）主持，桃原良毅的紀錄則出現在 1920 年代初期，其應該在前數年間加入該會社，並出任出張所主。出張所除經營煤炭批發外，並負責臺灣南部基礎工程之燃料供應，其中尤以打狗築港工程為代表。煤炭自西表島運至高雄後，再透過經銷管道售予糖業工場、鐵道部及港灣工程單位。此種貿易模式，使八重山煤炭於大正期的臺灣市場佔有一席之地，並與大倉、三井等大型商社形成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

此外，丸一洋行（丸一商社）由琉球舊藩主尚家侯爵資金創立，為沖繩資本體系的重要商社之一。其經營網絡遍及沖繩、臺灣、華南與香港，涵蓋煤炭、茶葉、糖業及航運等業務。於沖繩以那霸為本店，統籌琉球對外經濟拓展；於高雄湊町則設有分店，由桃原良毅負責在地事務，主力於八重山煤炭之再分配；於福州設點於南臺倉前，與盛豐洋行、東瀛會館等並列日本商業群體的重要據點，長期從事茶葉輸出，並一度壟斷琉球輸出茶葉的管道，直至明治 42 年前後因中國茶商競爭而失勢；於香港則在中環皇后大道設有營業所，作為對外貿易及金融聯繫的轉運中心。此外，丸一洋行亦涉足臺灣製糖業之運輸與價格協定。大正 5 年（1916）的《臺灣日日新報》即記錄其與三井物產、明治製糖等

¹⁰⁶ 內藤素生編，《南國之人士》（臺北：臺灣人物社，1922），頁 337。

¹⁰⁷ 商工社編，《日本全國商工人名錄》8（東京：商工社，1921），頁 B60。

¹⁰⁸ 蔡承豪，〈近代能源需求下的西表島煤礦與臺灣礦工流動〉，《臺灣文獻》75：3（2024 年 9 月），頁 69-73。

企業共同參與運賃協定之過程，顯示其業務已超越煤炭與茶葉貿易，進一步滲透至更廣泛的南方經濟產業鏈。¹⁰⁹

桃原良毅在高雄的職務，使其成為八重山煤炭輸出與臺灣市場銜接的重要中介。他既主理八重山炭礦株式會社業務，又以丸一洋行商人身分從事跨區貿易。同時，他與可能為親屬的桃原良弘，分別駐於高雄與福州，顯示該商社以親族式經營模式維繫跨地域的商業網絡。惟在 1920 年代初期的資料可得知其商事活動，後就少見其相關記錄。

桃原良毅在高雄的職務，使其成為八重山煤炭輸出與臺灣市場銜接的重要中介。他既主理八重山炭礦株式會社業務，又以丸一洋行商人身分從事跨區貿易。同時，他與可能為親屬的桃原良弘，分別駐於高雄與福州，反映該商社透過親族式經營模式維繫跨地域的商業網絡。惟現有史料僅能確知其在 1920 年代初期活躍於商務活動，此後關於其行跡的記錄則日益稀少，顯示其事業發展或生涯軌跡有所轉變。

總體而言，桃原良毅的經歷折射出琉球士族在近代日本「南進」經濟政策下的角色轉型。透過八重山炭礦株式會社與丸一洋行，他不僅推動沖繩煤炭資源納入臺灣經濟體系，更參與連結華南與香港的區域商業網絡。高雄作為新興港市，正是在此過程中成為琉球資本「南向」發展的戰略節點，其歷史地位因此不容忽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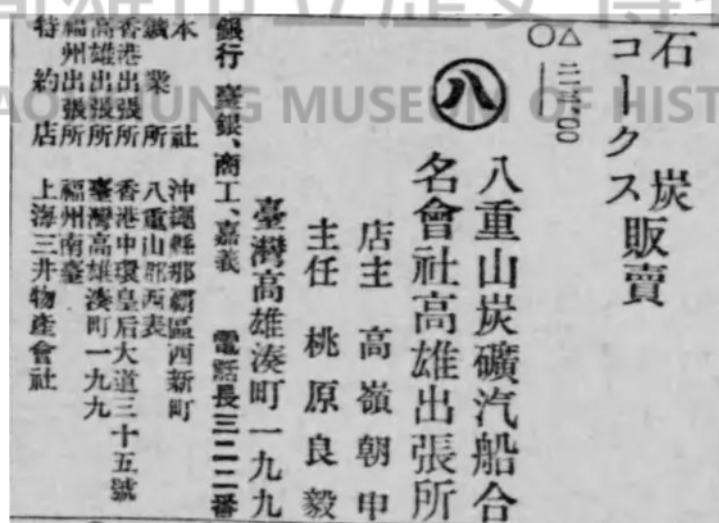


圖 22、八重山炭礦汽船合名會社高雄出張所之商業資料

圖片來源：商工社編，《日本全國商工人名錄》8，頁 B60。

（二）宮良永昌

宮良永昌（1910-?），出生於明治 43 年，畢業於基隆商業專修學校，亦即他係在臺灣接受近代商業教育。

日治時期，隨著新式教育體系在臺灣的全面建置，各級學校（如公學校、

¹⁰⁹ 〈運賃協定協議〉，《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 9 月 29 日，2 版。

小學校)對教科書與文具的需求快速增長,為文具業提供了一個龐大而穩定的市場。同時,隨著日本籍人口的移入、工商業的持續拓展以及行政機關的規模不斷擴大,對辦公文書用品與設備的需求亦隨之升高,進一步推動文具產業的成長。在這樣的脈絡下,基隆、臺北與高雄等都市陸續出現由日本商人經營的文具店,其中也包括了沖繩籍的業者。宮良永昌在離開基隆後,於某個時間點選擇了於高雄創辦壽屋文具店,並出任壽壽商事株式會社社長。¹¹⁰雖然目前尚無法完全掌握其店鋪經營的細節,但從其日後的發展觀之,這段在高雄的經營歷程,對他日後返鄉發展事業應具有關鍵性的助益。

戰後,宮良永昌在沖繩持續拓展其商業事業。1953年,他受任為美國治理琉球時期在琉球群島設置的琉球政府之經濟審議委員,並曾出任經濟民生教育副委員長等要職。其間,他於那霸市樋川三九(開南通)經營壽商事,代理日本測機舍的測量器材與文具用品,並積極參與工商團體,歷任琉球商工會議所理事、那霸商工會議所副會長等職務。他的事蹟記錄於《琉球紳士錄》(1962)、《沖繩年鑑》(1964)等出版物中,顯示其在戰後沖繩工商界具有一定地位。1987年,他所著的《沖繩時事放談》出版,內容收錄對戰後社會與經濟的評論,展現其長年參與公共事務的關懷與思考。¹¹¹

綜觀宮良永昌的一生,可以看到他如何在臺灣汲取商業教育與經驗,並將之轉化為在高雄經營,以及返鄉後的事業基礎。他的經歷不僅折射出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經濟結構所帶來的發展契機,也呈現了跨海移動者在歷史轉折中展現的韌性與適應力。從高雄到那霸,從文具到測量器材,宮良永昌的足跡訴說著一段跨地域的經濟人生,也略映照出戰前與戰後東亞社會連結的複雜面貌,並折射出時代的變動。

六、結語

潮汐往復之間,高雄港的城市風貌鋪展開來,歷史的軌跡亦在此逐漸浮現。於此港灣邊緣,一段段來自沖繩群島的移民故事悄然展開。日治時期的高雄,正從傳統漁村蛻變為現代都市;在總督府推動的南進政策與現代化進程下,這裡也成為沖繩移民群體的重要營生之地。這些穿越黑潮與東海的旅人,攜帶著琉球的記憶與文化,旅居於南臺灣的土地上,並於地方的社會結構與文化紋理中留下其歷史印記。

沖繩籍旅居者的出現,並非僅是人口統計中的一環,更以其社會參與與文化實踐,在日治高雄的城市轉型過程中展現出主體性與能動性。他們活躍於公務、教育、警政、醫療與商業等諸多領域,構成一個涵蓋中層專業職位的多元社群。透過具代表性的個體個案研究,本計畫試圖深入勾勒其移民背景、社會

¹¹⁰ 大沢貞吉編著,《台灣關係人名簿》,頁179。

¹¹¹ 宮良永昌,《沖繩時事放談》。沖繩:宮良紀雄,1987。

參與型態與文化適應經驗，藉以捕捉在宏大歷史敘事中不易察覺的個體動態與細節。

對於諸多沖繩移入者而言，高雄是一片充滿機會與挑戰的「新天地」。然這樣的經驗常伴隨語言隔閡、文化適應與社會階序的考驗，卻也成為眾多移民生命歷程中的關鍵轉折點。故對於部分長期旅居於此的人員而言，高雄不只是工作與生活的空間，更逐漸成為具有情感意涵的地域。

本研究透過整合多元史料來源—包括官方文獻、報刊資料與私人回憶錄—以重構數位日治時期沖繩籍旅居者於高雄地區的生活軌跡與社會行動。研究旨在突破以往單一宏觀的歷史敘事，轉而以微觀生命史的視角，探討個體如何於特定歷史脈絡與社會結構中展現能動性（*agency*）與適應韌性（*adaptive resilience*）。藉由重建這些歷史主體的行動脈絡，本研究不僅追索其職涯發展與社會參與的多重層面，也試圖理解他們如何在跨地域環境中調整策略、建立人際網絡，並形塑自身的社會角色。

固然，本研究所能擇取之個案受限於史料保存與可得性，多屬土族背景且以沖繩本島出身者為主，來自宮古、八重山等地者有限，難免呈現文獻記錄的偏向，未能全面反映基層旅居者的面貌。然而，這些個案分布於日治初期至末期各時段，具備一定的跨時代延續性與代表性。透過生命軌跡的比較與綜合，可見沖繩籍移動者在高雄的多重定位：從行政官僚、專業技術人員到教育工作者與商業經營者，於不同社會階層與經濟領域展現獨特角色。此種多樣性顯示，高雄社會並非封閉的單向權力體制，而是透過互動與協商所形塑的動態場域。且觀察若干個案，可發現這些旅居者並非皆是一帆風順。如上運天先次郎曾受同僚牽連而一度仕途中斷，後因轉機方得以重回職場，並於戰後重新回到沖繩參與重建工作。與儀喜助來臺後雖進入公職，卻一度因健康問題而不得不辭任原職。東恩納盛篤亦因至田蔡分校後，不幸罹患瘡疾，導致身體衰弱，於明治40年不得不提出診斷報告書及辭呈，依願免官。久高友貞更於返鄉途中，遭遇意外災害，因起貨機械意外墜落而重傷喪命。顯示外籍旅居者即便位在較具保障性的公教等領域，仍須於異鄉中面臨種種挑戰。

這些微觀層次的生命敘事，在交織與匯聚之後，形成了對整體歷史結構的深刻補充。它們使我們重新理解，在特定政權與社會條件之下，個體並非被動的受制者，而是能夠於制度縫隙中開創空間、重塑自我與他者關係的行動者。沖繩移民在高雄的生活實踐—從日常經濟活動到跨文化社交網絡的建立—展現出積極的社會參與與文化調適過程。這些行動不僅體現個體的生存策略，也在無形中促進了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的交流與融合，進而豐富了地方社會的多元面貌。

更值得關注的是，部分沖繩人士在臺灣累積的經驗，成為其戰後返鄉後重新投入地方建設與社會復興的重要基礎。本研究所列舉之神村孝太郎、上運天先次郎等人，即屬此例。沖繩在歷經慘烈的沖繩戰後，人力資源大幅流失，復興工程面臨巨大挑戰，因此自島外返鄉者多在重建過程中承擔關鍵角色。這些

人士在臺灣時期的生活與職務經歷，不僅培養了他們在跨文化環境中溝通協調與組織管理的能力，也促成其兼具區域視野與在地認同的歷史意識。其「往返於不同地域與時代」的生命軌跡，正體現了沖繩與臺灣之間長期互動、交流與連結的歷史縮影。

本研究透過重構沖繩籍旅居者在日治時期高雄的生命經驗，試圖揭示個體如何在多層次的社會結構中展現行動力、調適力與創造力，並從中理解近代東亞社會的跨地域流動與文化互動。這些看似零散的生命敘事，最終匯聚為一種深層的歷史省思——亦即，歷史經驗不僅限於統治與被統治的對立，更蘊含著人群互動、文化交會與生命韌性的多重意義。沖繩籍旅居者在高雄的足跡，因而不僅是個體命運的見證，更是港都早期發展與區域連結的重要篇章。而在寫高雄計畫的支持下，透過這些微觀的生命敘事，不僅為描繪沖繩移入者群體在高雄的多元參與提供了具體案例，更期待未來更能藉著這些基礎，為理解殖民經驗下的社會流動與族群互動機制開啟多元的詮釋視角。



七、參考資料

一、史料

上運天先次郎，〈遞信人としての感想〉，《臺灣遞信協會雜誌》，229期（1941年4月），頁75-76。

大園市藏編，《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澤書店，1916。

大園市藏編，《臺灣人事態勢と事業界》。臺北：大園市藏，1942。

小山田繼維編，《總督府職員錄》。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3。

山川岩吉編，《最近の南部台灣》。臺南：臺灣大觀社，1923。

与儀清，《台湾の宝庫と沖繩県》。与儀清，1932。

中山馨、片山清夫，《躍進高雄の全貌》。東京：片山清夫，1940。

內藤素生編，《南國之人士》。臺北：臺灣人物社，1922。

竹富町史編集委員会町史編集室編集，《竹富町史・第十一卷・資料編 新聞集成》。沖繩：町史編集室，1994-2004。

沖繩毎日新聞社，《沖繩毎日新聞》，歷年。

谷元二編，《大眾人事錄》第13版。東京：帝國密秘探偵社，1940。

東京電報通信社編，《戰時體制下に於ける事業及人物》。東京：大空社，1990。

林進發編，《臺灣人物評》。臺北：赤陽社，1929。

林進發編，《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成文，1999。

杉浦和作，《高雄州商工人名錄》。臺北：臺灣實業興信所編纂部，1929。

琉球新報社，《琉球新報》，歷年。

高雄市役所，《高雄市商工案内》。高雄：高雄市役所，1937。

高雄州，《高雄州要覽》，歷年。

高雄州水產會，《高雄州水產會報》，歷年。

間島三二，《南臺灣の寶庫と人物 高雄州の卷》。高雄：圖南社，1931。

新高新報社編，《臺灣紳士名鑑》。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

檜原翠邦，《沖繩縣人事錄》。沖繩：小澤書店，1916。

福田廣次，《專賣事業の人物》。臺北：臺灣實業興信社，1937。

臺南新報社編，《南部臺灣紳士錄》。臺南：臺南新報社，1907。

臺灣日日新報社，《臺灣日日新報》，歷年。

臺灣教育會編，《芝山巖誌》。臺北：臺灣教育會，1933。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1939。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

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日刊一週年紀念出版)》。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二版。

臺灣興南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府報》，歷年。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

二、近人著作

1、專書

又吉盛清，《大日本帝国植民地下の琉球沖繩と台湾：これからの東アジアを平和的に生きる道》。東京：同時代社，2018。

又吉盛清，《日本植民地下の台湾と沖繩》。沖繩：沖繩あき書房，1990。

大江志乃夫等編，《近代日本の殖民地》第5卷。東京：岩波書店，1993。

大沢貞吉編著，《台湾關係人名簿》。横浜：愛光新聞社，1959。

卞鳳奎，《日治時期日人在臺灣移民之研究》。新北：博揚文化，2016。

安里進、高良倉吉、田名真之等，《沖繩県の歴史》。東京：山川出版社，2004。

朱德蘭，《臺灣沖繩交流史論集》。臺北。遠流，2016。

沖繩県文化振興会公文書管理部史料編集室編集，《沖繩と臺灣》。沖繩：沖繩県教育委員會，2000。

沖繩県商工労働部編，《沖繩県労働史》。沖繩：沖繩県，1994。

松田良孝，《台湾疎開「琉球難民」の1年11ヵ月》。石垣：南山舎，2010。

松田良孝著，邱琬雯譯，《八重山の臺灣人》。臺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12。

松田良孝著，蘆荻譯，《被國境撕裂的人們：與那國台灣往來記》。臺北：聯經，2017。

後藤乾一，《近代日本の「南進」と沖繩》。東京：岩波書店，2015。

琉球政府，《沖繩県史》第12卷。沖繩：琉球政府，1966。

高雄市文獻委員會編，《續修高雄市志》。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1995。

新里金福、大城立裕著、琉球新報編，1969。《沖繩の百年：人物編 近代沖繩の人びと》。東京：太平出版社。

2、期刊論文

又吉盛清，〈沖繩女性と台湾植民地支配〉，《沖繩文化研究》，16期（1990年3月），頁329-352。

卞鳳奎，〈日本時期在基隆的沖繩縣人(1895～1943)〉，《臺北文獻》，直194期（2015年12月），頁139-189。

水田憲志，〈日本植民地下の臺北における沖繩出身「女中」〉，《史泉(関西大学史学・地理学会)》，98號（2003），頁36-55。

水田憲志，〈1930年代の石垣島における台湾人農業移民の入植過程〉，收於野間晴雄編，《文化システムの磁場：16 - 20世紀アジアの交流史》，頁229-251。大阪：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2010。

王御風，〈日治初期打狗（高雄）産業之發展（1895-1913）〉，《高市文獻》，17卷4期（2004年12月），頁1-18。

末武美佐，〈日治前期臺灣公學校的沖繩籍教師(1895～1918)〉，《臺灣學研究》，

11 期（2011 年 6 月），頁 59-85。

石川友紀，〈第二次世界大戰前の沖縄県からの出稼ぎについて〉，《人文地理》，25 卷 4 期（1973），頁 456-473。

石川友紀，〈沖縄県における出移民の歴史及び出移民要因論〉，《移民研究》，1 期（2005 年 3 月），頁 11-30。

朱惠足，〈作為交界場域的「現代性」：往返於沖縄八重山郡島與殖民地台灣之間〉，《文化研究》，第 5 期（2007 年秋季），頁 49-86。

朱德蘭，〈基隆社寮島的石花菜與琉球人村落（1895-1945）〉，收於琉球中國關係國際學術會議編委會編，《第 11 回琉中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頁 217-248。沖縄：琉球中國關係國際學術會議，2008。

西村一之，〈但願捕魚成功：由臺灣東部鏢旗魚觀其民俗〉，《臺灣文獻》，54 卷 2 期（2003 年 6 月），頁 97-112。

何義麟，〈戰後在臺琉球人之居留與認同〉，《國史館學術集刊》，18 期（2008 年 12 月），頁 129-163。

呂青華，〈基隆社寮島における沖縄人の調査報告〉，《東方學報》，25 期（2005 年 10 月），頁 146-155。

呂青華，〈戰後在臺沖縄人の處境—高雄「入船町」個案〉，收於曲金良、修斌主編，《第十二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頁 419-431。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10。

呂青華，〈蘇澳南方澳沖縄人移民村今昔〉，《政治大學民族學報》，30 期（2012 年 9 月），頁 1-35。

松田ヒロ子，〈沖縄県八重山地方から植民地下台湾への人の移動〉，收於蘭信三編著，《日本帝国をめぐる人口移動の国際社会学》，頁 529-558。東京：不二出版，2008。

松田ヒロ子，〈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沖縄系移民のエスニシティー「沖縄人」をめぐる葛藤と実践〉，《白山人類学》，14 期（2011 年 3 月），頁 7-30。

金戸幸子，〈1930 年前後の八重山女性の植民地台湾への移動を促したプル要因—台湾における植民地的近代と女性の職業の拡大をめぐって—〉，《移民研究》，3 期（2007 年 3 月），頁 1-26。

星名宏修，〈「植民地は天国だった」のか—沖縄人の台湾体験〉，收於西成彦編，《複数の沖縄 ディアスポラから希望へ》，頁 169-196。京都：人文書院，2003。

島村一郎，《昭和維新更生史》。東京：日本合同通信社，1939。

黃于津、李文環，〈日治時期高雄市「哈瑪星」的移民與產業—以戶籍資料為主的討論〉，《高市文獻》，5 卷 1 期（2015 年 4 月），頁 6-37。

黃紹恆，〈戰前臺琉關係之的建立、開展與客家人遷移〉，《客家研究》，7 卷 4 期（2014 年 6 月），頁 109-141。

楊玉姿，〈日治時期大林蒲之研究〉，《高雄文獻》，8 卷 3 期（2018 年 11 月），

頁 74-115。

編集部，〈復帰をひかえる沖縄の土木技術者たち〉，《土木学会誌》56：12（1971.12），頁 78-84。

蔡承豪，〈共力新天地：日治時期高雄地區的沖繩人士群像〉，《高雄文獻》，13 卷 2 期（2023 年 12 月），頁 33-83。

蔡承豪，〈近代能源需求下的西表島煤礦與臺灣礦工流動〉，《臺灣文獻》，75 卷 3 期（2024 年 9 月），頁 49-104。

3、學位論文

黃于津，〈日治時期高雄市「哈瑪星」社會構成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詹雅晴，〈帝國邊陲的沖繩家族——南風原一家的移動與其時代〉。臺北：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謝明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

4、會議論文

石丸雅邦，〈琉球人理蕃警察職員〉，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舉辦，「第三屆臺日原住民族研究論壇」，2010 年 8 月 27 日。

5、網路資源

〈竹田動漫祭〉。資料檢索日期：2023 年 3 月 3 日。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takedaas/photos/a.1565248400484389/838889066453663/?type=3&_rdr。

《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庫》。網址：<https://memory.culture.tw/>。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網址：<https://who.ith.sinica.edu.tw/>。

6、其他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110111 年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鳳山地政事務所日治時期檔案文物普查建檔第四期計畫」，2020。

附表、研究人士概況表

	屬性	姓名	本籍/出生日期	學歷/職務
1	公	北川涉吉	沖繩縣大宜味間切塩屋村 士族 1863.12.25	學歷不詳 陸軍教導團步兵科、沖繩分遣隊、沖繩師範學校書記官、沖繩縣尋常師範學校雇教員、沖繩縣巡查、八重山島役所在勤、鹿兒島縣尋常中學校雇教員、書記、臺東撫墾署主事補、嘉義縣主事補、臺中縣北港辨務署主記、臺灣總督府民政部通信課通信書記、 <u>鐵道部打狗出張所書記</u> 、臺北在鄉軍人會幹事
2	公	福地原名	沖繩縣島尻郡大里間切上與那原村三十一番地 1874.12.04	學歷不詳 警察本署總長專屬雇員、 <u>蕃薯蔡廳總務課技手</u> 、 <u>統計</u> 、臺東廳庶務課技手
3	公	儀間正良	沖繩縣國頭郡伊江村 1881.05.10	沖繩縣立中學畢 島尻郡書記、臺灣郡屬、 <u>高雄州書記</u> 、東港郡書記、屏東市役所財務課雇、琉球庄長
4	公	城間恒人	沖繩縣 1883.06.23	東京帝國大學畢 秋田縣山本郡長、樺太廳理事官、樺太廳警察部長、樺太廳拓殖部長、 <u>高雄州內務部長</u> 、 <u>高雄州青果同業組合組長</u> 、高雄州協議會員
5	公	赤嶺直	沖繩縣島尻郡小祿村大字榮原 1892.08.11	沖繩縣島尻郡立農學校畢 殖產局庶務課、 <u>高雄州內務部地方課屬</u> 、屏東郡役所庶務課屬、恆春郡役所庶務課屬、 <u>鳳山郡役所大寮庄長</u> 、 <u>鳥松庄長</u> 、 <u>鳥松庄米穀共同搗精組合長</u>
6	公	上運天（平川） 先次郎	沖繩縣島尻郡佐敷村字新里七四五番地 士族 1894.06.17	通信傳習所畢 基隆郵便局通信掛通信事務員、通信助手、通信手、臺南郵便局郵便課通信事務員、通信手、淡水郵便局通信係通信書記、遞信局監理課通信書記、臺北郵便局郵便課書記、遞信部為替貯金課書記、遞信部保險課書記、 <u>交通局高雄郵便局副參事</u> 、 <u>局長</u> 、 <u>高雄州防空委員會委員</u>
7	公	友利惠任	沖繩縣宮古郡下地村興那霸 1895.08.06	學歷不詳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塩務課勤務、北門郡出張所勤務、 <u>岡山郡烏樹林出張所勤務</u> 、彰化郡鹿港出張所勤務、東石郡布袋出張所勤務

8	公	神村孝太郎	沖繩縣那霸市久米町二丁目 1897.06.30	熊本高等工業學校畢業 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技手、技師、 <u>高雄鐵道事務所工務課技師</u>
9	公、商	與儀喜助	沖繩縣島尻郡高嶺村字大里八四 1886.08.08	小學畢 新竹廳雇、新竹廳屬稅務課、高雄州屬、屏東稅務出張所、 <u>高雄州稅務課直稅係主任</u> 、東港製冰株式會社常務取締役、東港信用販賣購買利用組合理事
10	公、商	與儀喜宣	沖繩縣島尻郡具志頭村字具志頭二九四番地 士族 1886.07.08	沖繩中學校、東京水產講習所畢 福山縣水產講習所練習船高雄丸漁撈長、島根縣水產試驗場技師、水產試驗場長、農商務省技師、水產局勤務、總督府技師、殖產局勤務、基隆支場長、 <u>拓洋水產會社專務取締役</u> 、 <u>臺灣底曳網水產組合高雄支部理事組合長</u> 、 <u>高雄州水產會評議員</u> 、新高水產開發取締役
11	司法	花城長昱	沖繩縣八重山郡石垣村字新川八番地 士族 1881.05.25	沖繩縣立師範學校、法政大學專門部法律科畢 沖繩現八重山郡大川尋常小學校訓導、兼任八重山島高等小學校訓導、那霸區高等小學校訓導、八重山郡竹富尋常小學校訓導兼校長、東京市山伏町尋常小學校訓導、東京府南葛飾郡砂町尋常高等小學校訓導、臺灣總督府法務部民刑課囑託、臺北地方法院判官、臺南地方法院嘉義支部判官、臺北地方法院宜蘭支部判官、 <u>臺南地方法院高雄支部判官</u>
12	司法	高嶺方美	沖繩縣八重山郡 1883.02.18	沖繩縣師範學校、私立中央大學法科畢 高等法院上告部判官、八重郡大川尋常小學校教諭、東京市練成小學校訓導、沖繩縣大濱小學校長、石垣小學校長、宜野灣小學校長、辯護士試驗及弟司法官試補、判官、府法院判官(臺北地方法院)、高等法院覆審部部長、新竹支部合議部部長、新竹法院長、 <u>高雄地方法院長</u>
13	醫	宜保之春	沖繩縣那霸市久茂地町一丁目六十三番地	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 警務局衛生課技手、福州博愛醫院勤務、花蓮港醫院醫官補、臺北刑務所花蓮港支所囑

			士族 1905.03.08	託、 <u>高雄醫院醫官（眼科）</u>
14	警	宮城 久安	沖繩縣國頭郡國 頭村 1899.8.17	學歷不詳 <u>恆春郡役所警察課警部補、鳳山郡役所警察 課警部補、屏東郡役所警察課警部、高雄州 警務部刑事課警部、高雄消防署長、旗山郡 役所警察課警部、琉球政府行政監察課長</u>
15	警	上原 繁喜	沖繩縣那霸市垣 花町 1893.11.25	學歷不詳 <u>臺南廳大目降支廳雇員、臺南廳鳳山支廳雇 員、鳳山郡役所警察課雇員、高雄州衛生課 雇員、衛生技手</u>
16	警	伊川 長壯	沖繩縣那霸市安 里三四七	學歷不詳 <u>高雄州警務部衛生課雇員、高雄州總務部總 務課雇員、東港郡役所庶務課、岡山郡役所 庶務課、琉球政府人事委・事務局給與課長</u>
17	警、 商	伊地 柴清	沖繩縣首里市當 藏町二丁目二十 七番地 1879.12.25	學歷不詳 <u>楠梓庄協議會員、煙草賣捌人組合理事、自 動車會社重役、青果同業組合役員</u>
18	教	東恩 納盛 篤	沖繩縣首里區字 真和志九六八番 地 士族 1867.07.11	沖繩縣尋常師範學校畢 <u>沖繩縣首里尋常小學校訓導、恩納尋常小學 校訓導、熱田簡易小學校兼任、臺灣臺東國 語傳習所教諭、臺東國語傳習所太巴塢分教 場教諭、臺東廳太巴塢公學校教諭、蕃薯藔 公學校田藔分校</u>
19	教	久高 友貞	沖繩縣首里區 1869.11.06	沖繩縣尋常師範學校畢 <u>深坑廳新店公學校雇、鳳山廳楠仔坑公學校 教諭兼任校長、鳳山公學校港仔墘分教場教 諭</u>
20	教	東恩 納盛 亮	沖繩縣首里區字 山川二百四十六 番地 士族 1878.03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 <u>新竹廳頭份公學校教諭、澎湖廳港仔公學校 教諭、澎湖廳白沙島公學校教諭兼校長、嘉 義廳水堀頭公學校教諭兼校長、阿緱廳頓物 公學校教諭兼校長、蕃薯藔公學校六龜里分 校教諭、高雄州旗山第二公學校教諭、訓導 兼校長、高雄州吉洋公學校訓導兼校長、澎 湖廳馬公第一公學校訓導兼校長</u>
21	教	上原	沖繩縣島尻郡小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

		龜	錄間切具志村十四番地 1879.03	<u>蕃薯蔡廳蕃薯蔡公學校教諭</u>
22	教	山城正鳴	沖繩縣那霸市士族 1880.11	沖繩縣立第一中學校、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 太保公學校教諭兼校長、鹿仔草公學校教諭兼校長、 <u>太社公學校教諭兼校長</u>
23	教	漢那朝茂	沖繩首里市山川町一丁目四十一番地 1885.04.21	沖繩縣立中學校畢 高雄州新園公學校訓導、高雄州萬丹公學校訓導、高雄州萬丹公學校訓導、 <u>高雄州大林蒲公學校校長</u> 、 <u>高雄州田寮公學校校長</u> 、 <u>高雄州右沖公學校校長</u> 、 <u>高雄州舊寮公學校</u>
24	教	外間政善	沖繩縣那霸市高橋町二丁目六十四番地 士族 1892.11.28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 高雄州萬丹公學校勤務、新園公學校校長、林邊公學校校長、九塊公學校校長、竹園公學校校長、里港公學校校長、 <u>美濃國民學校校長</u>
25	教	平識政龜	沖繩縣 1893.02.17	沖繩縣師範學校畢 高雄州高雄第一尋常高等小學校教諭、訓導、 <u>鳳山尋常小學校長</u> 、屏東市海豐國民學校校長
26	教	東恩納信	沖繩縣士族	<u>高雄州旗山第二公學校教諭心得</u> 、 <u>教員心得</u> 、 <u>高雄州吉洋公學校訓導</u> 、澎湖廳馬公第一公學校訓導、 <u>高雄州手巾寮尋常小學校教員心得</u> 、 <u>高雄州吉洋公學校教員心得</u>
27	商	桃原良毅	沖繩縣首里區儀保町 1884.09	沖繩縣立中學校畢 <u>八重山炭礦株式會社高雄出張所主任</u> 、九一洋行貿易商
28	商	宮良永昌	沖繩縣那霸市樋川三九 1910	基隆商業專修學校畢 <u>壽商事社長</u> 、 <u>高雄壽屋文具店</u>

說明：1、學歷/職務加底線標示，係與高雄相關者。2、部分出生日期資訊缺漏者，僅列示已蒐集或可辨識之資料。